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说 明

为了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史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套学习材料。本书是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分专题编辑起来的。

毛主席著作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历史的基本教材。我们编辑这套学习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以进一步提高我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由于大家都有《毛泽东选集》，凡选自《毛泽东选集》的著作，我们只列目录，不印内容。

本着以自学为主的原则，我们编选了一部分党的历史文件，供同志们自学时参考。但在这些文件中有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律未加注释。同时，为了增强我们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我们还附录一些反面材料，供大家批判。

由于我们的路线觉悟和理论水平不高，本书的编辑工作难免有很多缺点和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

一九七五年十月

目 录

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毛主席著作：

民众的大联合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八月四日）……………（ 2 ）

参考文件：

共产党底根本主义

（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
……………《共产党》短言 （ 15 ）

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

（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
……………《共产党》短言 （ 17 ）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一九二一年）……………（ 19 ）

第二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反对陈独秀右倾机 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著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六年三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十一页，
这里所列的页码为精读部分。下同)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同上书第十二——二十二页)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同上书第一四二——一四三页)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同上书第四卷第一一五三页)

《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同上书第三卷第五七〇——五七一页)

参考文件：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 (26)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 (62)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

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
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
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 (92)

附录：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陈独秀 (98)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陈独秀 (105)

第三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反对瞿秋白“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著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十七—
五十五页)

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同上书第五十六—八十二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同上书第九十四—一〇四页)

参考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附录: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125)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瞿秋白 (144)

第四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李立三“左”倾机会
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著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八

——一三九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同上书第一七〇——一八〇页、

第二一〇——二一一页)

学习和时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同上书第三卷第九〇一——九〇二页)

参考文件：

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152)

附录：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李立三 (156)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

的首先胜利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 (176)

第五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斗争

参考文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

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194)

附录：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

大纲

(一九三一年一月) ……罗章龙 (199)

第六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著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九页、
一七一、一八八——一九〇页)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同上书第一四〇——一四一页)

论政策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同上书第二卷第七二〇——七二一页)

参考文件：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 (218)

附录：

中央四中全会决议案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 (228)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摘录）
（一九三一年二月）……陈绍禹（247）

第七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著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九页、
一八二页）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

（同上书第二卷第四九二——四九八页）

整顿党的作风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同上书第三卷第七七九——七八〇页）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

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六页注
〔1〕）

参考文件：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259)
-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263)
-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报告
 大纲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 (264)

附录:

- 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央同仁商榷抗
 战救国诸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
张国焘 (271)

第八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王明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著作:

-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五七——
 三六九页)
-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

(同上书第四八五——五〇一页)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同上书第五〇二——五〇五页)

战争和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同上书第五〇六——五二一页)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同上书第四卷一一五二——一一五四页)

参考文件：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摘录)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296)

附录：

挽救时局的关键 (摘录)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王明 (306)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摘录)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王明 (314)

第一讲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毛主席语录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摘自《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一三六〇页。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摘自《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六六〇页。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摘自《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九九四页。

毛主席著作

民众的大联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萨藩”，“长藩”，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

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利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

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做“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从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为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鸷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

——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选自《湘江评论》第二期，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

民众的大联合（二）

以小联合作基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

上一回的本报，已说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今回且说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

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

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仇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椅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

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我们图书室是空的，我们游戏场是秽的。国家要亡了，他们还贴着布告，禁止我们爱国。象这一次救国运动，受到他们的恩赐真多呢！唉！谁使我们的身体精神，受摧折，不愉快？我们不联合起来，讲究我们的“自教育”，还待何时？我们已经堕在苦海，我们要讲求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咬人的先生们，不要靠他。遇着事情发生——象这回日本强权者和国内强权者的跋扈——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着在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的自由的恶魔！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刻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我们为着没有钱，我们便做了有妇的鳏夫。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里的孤住着，相望着。教育学上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难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员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我们为着没钱，便不能买书，便不能游历考察。不要说了！小学教师横直是奴隶罢了！我们要想不做奴隶，除非联合我们的同类，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

诸君！我们是警察。我们也要结合我们同类，成功一个有益我们身心的联合。日本人说，最苦的是乞丐，小学教员和警察，我们也有点感觉。

诸君！我们是车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车主的赁钱那么多！得到的车费这么少！何能过活，我们也有什么联合的方法么？

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

上面所说的小联合，象那工人的联合，还是一个很大很笼统的名目，过细说来，象下列的

铁路工人的联合，

矿工的联合，

电报司员的联合，

电话司员的联合，

造船业工人的联合，

航业工人的联合，

五金业工人的联合，

纺织业工人的联合，

电车夫的联合，

街车夫的联合，

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方是最下一级小联合。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象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事，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象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选自《湘江评论》第三期，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版

民众的大联合（三）

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

（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

毛泽东

上两回的本报，已说完了（一）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二）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于今再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一）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虽然仍是少数所干，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腹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

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此问我直答之曰“有”。诸君不信，听我道来——

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建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其后革命党化成了国民党，咨议局化成了进步党，是为吾中华民族有政党之始。自此以后，民国建立，中央召集了国会，各省亦召集省议会，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一为省教育会，一为省商会，一为省农会（有数省有省工会，数省则合于农会，象湖南）。同时各县也设立县教育会，县商会，县农会（有些县无）。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结。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组设的各种团体，象

各学校里的校友会，

旅居外埠的同乡会，

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分会，

上海日报公会，

寰球中国学生会，

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

北京华法教育会。

各种学会（象强学会，广学会，南学会，尚志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科学社，亚洲文明协会……），

各种同业会，（工商界各行各业，象银行公会，米业公会……），

各学校里的研究会（象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有几十种）

各种俱乐部……

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上列各种，都很单纯，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小联合”。最近因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更增加了觉悟，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象什么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全国商会联合会，

广州的七十二行公会，

上海的五十三公团联合会，

商学工报联合会，

全国报界联合会，

全国和平期成会，

全国和平联合会，

北京中法协会，

国民外交协会，

湖南善后协会，（在上海）

山东协会，（在上海）

北京上海及各省各埠的学生联合会，

各界联合会，

全国学生联合会……

都是。各种的会，社，部，协会，联合会，固然不免有许多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象国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全国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乃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则纯粹平民及学者的会集。至最近产出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的联合，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

（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果有此能力么？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依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么久，还没一头走欧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象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

容易谈到民众的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

虽然如此，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時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选自《湘江评论》第四期，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出版

参考文件：

共产党底根本主义*

《共产党》短言

欧洲有许多报上常说：共产党是什么一个怪物，有何魔力，使他们的党势在欧美各国都有一日千里之势？我以为这个疑问很容易解答。资本主义不能够解决现社会致命的困难维系现社会最大多数的人心，这是不可掩蔽的事实了；继他而起的：无政府主义，除无政府党外，都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方法实现的空想；议会派的和平改革在英德法都试验过不行了，在政治腐败的国家更不必试验了；因此大家既不取无政府的空想，又不取议会派敷衍现状的方法，不趋向主张破坏而且有建设方法的共产党还有何路可走？

共产党和议会派不同底要点：是主张阶级战争，不赞成在资本阶级的政府底下讨恩惠；和无政府主义不同底要点：是主张在现在及近的将来，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有相当强制力的法律，不赞成一概不加限制的自由。

有人责备俄国共产党主张劳工专政，不合乎德莫克拉西。我要问他：是不是要让资本家帝制派都有政权才合乎德莫克拉西？有人责备俄国共产党用武力对待反动派，不合乎公理。我要问他：是不是要让资本主义的英法军队打破莫斯

* 原题为：《短言》。——编者注

科驱逐共产党，或是让柯尔恰克丹尼金统治俄国才合乎公理？

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是怎样呢？就是主张一切生产及交换工具都归公有，不许私人把财产用做生产或交换工具来增加他的私有财产；却不是“平均财富”这类浅陋的主张，也不是“彼此通财”那样普通的习惯，我们不可认错了。

选自《共产党》月刊第四号，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

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

《共产党》短言

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

我们中国经济底组织及状况，在世界各文明国中，不用说是很幼稚的了；但是这幼稚的经济底组织及状况，一方面固然是悲观，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乐观。乐观在那一点呢？正因为他们的组织及状况很幼稚，改造起来不像欧美那样伤筋动骨。现代的经济变动是世界的不是国别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的使命。

君主政治的滋味，世界各民族中，总算我们中国人尝得最足了。代议政治在中国虽说试验底岁月尚浅，而就一般的教育缺乏及中上阶级之腐败无能力看起来，代议政治在中国比在欧美更为无缘。所谓国会省议会县议会，无一不演出种种怪状丑态，简直到了末路了；所谓“议字号”的先生们，在人民头脑里比粪坑还臭千百倍。什么武力统一，最好也不过像民国元二年光景；什么联省自治，不过是武人割据改换了一个名称。试问南北各派政党，那一派免了鼠窃狗偷，那一派有改造中国底诚意及能力？全国民在这徬徨歧路之中，

• 原题为：《短言》。——编者。

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而出，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

选自《共产党》第五号，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一九二一年)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至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 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和征用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工具；

(4) 加入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民族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受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去地方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

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转为正式党员，如果该地还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对于重要的暗号和党籍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中的党员人数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

十一、（注：遗漏——原译者注）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的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这个纲领须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此件为共产国际保存的俄文本译稿)

第二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一页。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八页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

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一页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八页

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一五页

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

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五三页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〇九页。

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仗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二——
一四三页

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二六页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斯基那一派去了。

参考文件：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鉴：

(一) 绪 言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到了极艰巨的挫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他自己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与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工农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遇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狗。压迫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动军阀一直到被革命所吓慌的小资产阶级。然而现在他们

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背叛了国民党的主义及传统，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动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全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它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着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的白色恐怖，要在汪精卫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

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现在的形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它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务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挥犯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它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

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的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做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奋斗”。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动摇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指导机关的共非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以及不革命的行为，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欧洲各国无

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残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深，领导农民运动的武装暴动能够在各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像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里的一页，农民协会的实际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群众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于乡村农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级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努力的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彻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得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信用。党的群众是我们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何大，都是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动摇和犹豫，没有坚决实行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

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之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种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斗争；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末，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般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与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无产阶

级之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之一种，实际上便使无产阶级变成‘民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制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维持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厉害——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另一方面观察，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保存而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末，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又受其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而不得不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

产阶级在今年四月间，饱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像，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它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彻底、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的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的斗争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的成分，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分，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态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深入，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向左倾，愈能站到革命的战线上来；反之，如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彻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资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动摇犹豫的人，必先自己开始便应当不动摇不犹豫”。我们是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策略；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之动摇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当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目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

决定共产党的革命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的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是孟塞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仿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所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乎忽略反帝工作”，仿佛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到不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更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共产党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信里又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过渡这种难关，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

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革命运动是工人问题”，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与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个机会主义者辩论，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

（三）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再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时期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的时期

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及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领导工人每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尽力量增进工人阶级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同时共产国际指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其中最觉悟最有组织的分子。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斗争是相符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行动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它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和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主权属于政府。在各阶级联盟的政府之下，其先一时期，这一政府而且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这在客观上是有种种的利益，实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实在大大的阻碍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有不得政府同意，不能有企业中之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须要守劳动纪律的决议，我们中央并没有反对。中央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

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使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方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不使他们为自己阶级直接的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当时规定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察是错误的。对于国民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

自然爆发而发展的工人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并且发生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及广大的劳动童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而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工业的危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如是不仅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说不应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闭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决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

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进行，中央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它反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国民党中央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

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也是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的秘密工会，而使它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占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分子减少些，说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的工人，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的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四）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

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寺院、官僚等一切土地；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禁止苛约，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反抗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领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的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指示指令的，乃是违背它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它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以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的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

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在第五次大会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为领袖的共产党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两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立即解决，当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七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是湖南农民协会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配土地的时候了，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跟着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领袖，尽力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动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将军们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动是蒋介石的奸细做

的，共产党的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门从事挑拨离间，他们为左倾之宣传，然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的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挥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的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起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说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的政权交付于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了民困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意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农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义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样的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党的中央坚决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正月二十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的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际

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正月二十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放弃第五次大会所议决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一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将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末，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末，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败退。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斗争的决心，简直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有看看二十六日的议决

案：“现在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地步，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专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似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际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忙了湖南事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其出轨范而侵害无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反革命的妥协的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末，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

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五)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指导政策，亦是遭了同样的妥协主义错误的铁链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此问题的理论与实际，决不与共产国际之指示及党下层机关之活动相似。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持的态度，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议决案上有特别详细的规定，但在此决议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前给过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之观点，曾经向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过完善的通知，但我们中央在实际上的动作，恰与国际的方针相违背，这是证明党的指导如何深远的在那里执行自己的妥协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下面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的先锋，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与最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要有区别。

“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合，它应有独立的力量；它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旗帜之下动员群众的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它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之民权派的动摇不定的权利，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

“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

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由勇敢的坚决的发展群众运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民众的群众组织。

“共产国际指示中央对国民党当前任务，须要有适合它们的组织形式；必须要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去，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工农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工农兵士与手工业者的组织，实行团体的加入（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的储蓄组织，兵士的组织，农军，红枪会——除去反革命成分——工人纠察队等），国民党地方与中央机关应完全实行选举制等等。

“只有此等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使它们成为真正广大的、真正选举的、真正群众的、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组织，才能创造发展中国民权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对抗国民党右派一部分动摇分子之不可避免的退出（譬如广东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的反对那些背叛的军官。共产党应即时的暴露与蒋介石或帝国主义妥协的种种动摇政策，并且定出适当的宣传煽动及组织的具体办法。

“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影响，它要担负起此等任务，则必须完全认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组织之努力与巩固，并吸收工人党员参加党的指导，提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并发展党在群众中的权威。”

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与国际

决议案上所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人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小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所依据的立场，实际上既与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则它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面貌之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亦与国民党的指导犯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以致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它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到了与国民党“右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份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们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众运动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党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失败，恐莫此为甚吧！

再此决议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当使

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之指导？！

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它的领袖还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决议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回答，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共产党领袖也有这样说的：一方面自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一方面则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严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策略”。共产党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末，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彻底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彻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关于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版一份党的日报（虽然国际之多次催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领袖。

对于领袖作用的估计过分，而估计群众作用太低的流弊，可以从党对于许多主要问题的估量看得出来。党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应当使其中立；但不是说工人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譬如为要使李济琛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省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

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不提出免他的职的口号；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左派”的领袖之愿欲来确定，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联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议决；虽然中央以前很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向北去的建议。在其他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如此。

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是自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我党所指导的群众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它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入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需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发展并巩固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巩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者却说“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号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胆怯政策与最后所干的自动解除武装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月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的政策之一部分。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于六月三十号中央扩大会

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现在指几条出来看看：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主义，须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组织，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这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

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监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什么呢？

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国民党联合的方法是这样的！这些认识是毫无半点共产主义政策的意味。列宁认为共产党的党员可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协商，但是在保持共产党的宣传、煽动与政治活动之完全自由必要条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宁说，没有这种条件，自然不能与之联合，否则便是叛变。客观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是对共产主义的变节。列宁对于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时常说：“**要注意‘友军’如同注意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则认为应当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分给工农运动很明显的敌人。

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它的力量与它的将来，是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要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了，谁能公开的反对国民党中央是国民革命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引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决定。所谓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知识分子、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和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六）共产党员之参加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在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同志的行动上，与党对参加国民政府的整个方针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与其他许多主要革命问题一样的，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武汉政府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共产党，应当很坚决的在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同盟者之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

共产国际执委特别叫中国共产党注意：现时革命政府与民众之密切的联系是十二分的必要。只有在这种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才能经过国民党而实行这一政策，只有建筑在群众上的方针，才能够渐渐的巩固革命政府的政权，及其为革命之组织中心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武汉政府的这种影响。不能实现这种任务，不能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土地革命及坚决改善工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使国民党变为真正的劳动群众的广大组织，没有继续的巩固工会及发展共产党，武汉政府没有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那就不能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的实现。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证实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的必要。若无此条件而参加，就带有上层的勾结与政客的结交性质，而他们必须为实际的生活与伟大的阶级斗

争进展所摒弃；更要时常使政府工作与群众工作相联系，实是中国共产党必要的任务。

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参加政府问题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党员的部长做了些什么？看事实：

共产党员在得到委令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之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默无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民的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则“严罚”。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的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数月内，它们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与乡村中剥削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劳动法案，减租等，农村自治法等），有些并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部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议决案是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与群众联系，来维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成了最腐烂的资产阶级官僚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去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庇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特别是农政部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塞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适合名称。土地问题应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被它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的调查表，竟无一关于土地关系问题。谭××同志上任第一件事实，就要打算“镇压”湖南农民运动，中央对此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

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一次出征已经成行，但走到了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次叛变很敏捷的很彻底的实现了谭××同志所领导的出征之任务。

当谭××同志结束他那不光荣的总长之地位时，还是借口长期请假退出的。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境域内巩固，当国民党正在酝酿不要共产党参加政府的趋向，以便可以完全的自由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反革命军官妥协时，谭××同志却很愿去迎合反动军官与多情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的胜利的办法，是借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现他的部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先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的；但中央不仅不反对这种行动，反而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七月三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十一条中有说：“避免纠纷”，同意于临时退出，这是所谓“革命”的政策。

谭××既因病而请了长假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不能纳农运于正轨”。共产党部长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脱逃还不够，而且重新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个人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几句话里得到的什么结论？即：一，农民运动走上不正的道路；二，只有武力能纠正它，因为共产党员的部长，有了共产党与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是对的，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们的代表进攻革命。共产党员的部长在政府内做了这些玩意，还不是共产党的最大耻辱吗？但是中央对于谭××的声明，不仅没有处罚，并且没有发表一句话。本来中央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是它自己的政策。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的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上去，是为的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分，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它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部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的见解相差不知有多远。当一九〇五年俄国亦是同样的民权革命的任务，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说：

“我们还应当为临时革命政府，指出一个合于目前历史客观条件，且合于社会民主派目前责任之行动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政纲。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全部的最低限度的政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的经济之关系的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亦即本党最近将来全能见诸实行的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这是一方面根据社会经济关系的必要；别方面就是为今后斗争起见，为实现社会主义……。

“可是有人反对说：临时政府既为临时的，便不能执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积极的政纲；这种反驳，反只是反动派的一种诡辩法。所谓不执行什么积极的政纲，就是说要忍耐这种专制下的农奴制度，能够忍耐这种制度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政府，而不是为民众暴动机关的政府…无产阶级为要实行自下而上的来威逼政府，就应该武装起来……武装威逼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看来，这些胜利，应为本党全部最低限度党纲之实现……。

“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且即时压迫反革命的斗争机关，而决不是求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

“且这种胜利定将成为一种专政，就是它必须要依靠武力，依靠武装的群众和暴动，而不是依靠什么别的机关——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而造成的机关。因为要实现为无产阶级及农民一些急不容缓的要求‘必定引起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专制政府之残酷的反抗；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压倒此种反抗与打破反革命之企图……。”

武汉政府现在亦变为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专政，而是地主资本家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的政策，即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的实现的！

（七）武装问题与军队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主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之观点。

人人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能暂时与革命相伴，都是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意兵士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动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但军阀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与此相反，一切政

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作用，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时间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月的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许多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等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都是非常机会主义的。湖南政变反共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之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成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八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已是很明显的了。

湖南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限于此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的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在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样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亦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策略和他们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变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为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涵些。党的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就使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碎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后者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时，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取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合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候，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八）党的问题与对国际问题

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的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是无置议的可能，无论如何都是对的。这种执行之下，党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甚至于党有极大的公开作用的地方，所谓党的民权主义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在这种党内情形之下，自然中央只有用命令方法去实行自己的指令，所以

它自己也不求真正实行党内的民权主义。

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完全不合组织的，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无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的拒绝对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这已经不单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要知道中国革命不但是全国的意义，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部分足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呢。中国共产党不但执行极不正确的政策，使革命陷于失败的政策，自动的取消革命而投降；并且很坚决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服从国际的指导。不但如此，还要故意破坏国际的责任与纪律，甚至认为可以不把国际决议通知全党，使党员得以研究而说出自己的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最近不得不公开的批评我们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

(九) 结 论

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是非常之好的。我们是很坚决的承认过去中央指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在这一封信里，我们已经在正确的共产主义的观点上，分析过去的错误，我们是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的分析的，应当要使全党及每一个党

员，极注意究研这些问题。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的讨论过去党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以及这封信便是讨论的根据。党员不能接受过去的教训，他便不能向前进行，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

讨论之中应当求得相当的结论。应当不但批评过去党的指导，而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的成分，而且必须将全党工作都依照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审查过，审查事实上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劳动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

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应当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更加多的帮助它的工作，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中央这次完全赞成无产阶级的政策，而要党的中央委员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真是觉得这是有害于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所以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的地位，应当知道同它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虽然政治的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实行党的民主主义，使党的政策直到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并且必须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勿使为反动派所破获，要建立壁垒森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秘密的党的机关。

在严重的环境之下，不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

设备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很充足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改进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必须召集全体党员，积极的来帮助党的这件事，我们深信同志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其对于革命的忠心，实必能使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的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选自《中国问题指南》第二册，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一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一) 世界革命之发展

一、苏联十月革命时为世界革命发展之第一期

最近十年之间，世界革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欧战——帝国主义大战之结果，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独载制胜利，世界革命之第一阶段就从此开始。那时西欧各国也有激烈的革命危机（德国、意大利、奥国、匈牙利等）。

二、西欧各国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使革命失败

因为共产派——无产阶级的先锋，当时还很幼稚薄弱，没有团结巩固的共产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奸细，工人阶级的极大部分，仍旧在他们这种改良主义政党的领导之下——所以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受着创钜痛深的长期的失败。只有苏联的革命是胜利了。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失败，却仍然能够压迫工人阶级，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暂时的局部的得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

三、世界革命时代之第二期及资本主义之部分稳定

世界革命形势的第二阶段之中，便是资本主义局部的暂

时的稳定：世界金融贸易生产额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线，资产阶级广大的进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产机关急剧的实行节省主义（Rationalisation），根本上是更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取消劳动者在前一时期中所争得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工资的增加，政治的自由等等）。

四、国际帝国主义系统之中的主要矛盾却在剧烈起来

虽然如此，一方面固然世界资本主义有稳定的过程，使生产力恢复而增高，甚至超过欧战以前的程度；然而别方面，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巨大的主要的矛盾也日益剧烈起来。

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关系日益险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生长起来。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深入，以至于引起许多直接的武装斗争及暴动（中国、爪哇、印度、摩洛哥、叙利亚等）。再则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剧烈，以至于有世界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

五、世界革命之第三时期便是帝国主义的新旧矛盾一齐紧张起来

所有这些矛盾的剧烈，便是世界革命的第三阶段开始。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点是：工人阶级的左倾和革命化，东方殖民地几千万的群众，起来参加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苏联更加成为摇动资本主义稳定的强有力的动力，更加成为各国工人运动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心。

六、革命暴动，反苏联的战争，以及列强大战是这一时

期的前途

世界革命的第三期，重新要有工人阶级公开的决定胜负的发动，要有殖民地的暴动，同时反对苏联的武装战争会有实现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也有许多巨大的冲突之可能。

(二) 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一、世界革命的形势使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估量现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必不可免的：是要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变到来，他的性质将要是极剧烈的阶级冲突。因此，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起来，他本来是总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劳动群众的斗争，反帝国主义，反对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剥削他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这就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前进。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比现在民权革命的阶段更加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组成部分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更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组成部分。同时，中国革命波及邻近各国——巨大的殖民地，如印度支那、爪哇、高丽等，唤起被压迫民族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政治斗争，根本上要动摇日本、英国帝国主义的基础，而且给北美合众国的帝国主义以巨大的打击。因此，中国革命的完成，亦就是世界

无产阶级独裁制之胜利的序幕。

二 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

(三) 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

一、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中国现时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的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他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

二、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

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

二、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

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暴动革命的方法，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工

农民权独裁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然后才能够解决这两个任务。

三、推翻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都必须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工农民权独裁方能完成

三、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最好方式。

四、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摇动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

因此，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四）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

一、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

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之中，他的主要口号是：

-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 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 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五）中国革命的动力及其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前途

一、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便建立起来（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他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二、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恐慌时代，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年，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是在生长，这就足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去力争革命之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

同时，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点。只有斗争，只有力

量，只有无产阶级贫农的团结力与组织力，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什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

三 过去斗争的经验

(六) 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一、民族联合战线时期进到左派国民党时期后，武汉中央也反动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到第六次大会之间，中国革命经过极重大的许多事变：北伐的胜利，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迅速的革命化，工运农运在半公开的条件下去却来了中国革命几次严重的失败，丧失革命所得的胜利，共产党受着摧残，群众运动受着压迫。

中国革命发展，便发生阶级力量的分化，这就将中国资产阶级吓退，使他投降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营垒里去。中国革命的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到了这个时候，便转到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了（所谓武汉时代）。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营垒，变成反革命的力量之后，蒋介石叛变之后，左派国民党的武汉中央便一天天的动摇起来，一天天的反动起来。武汉中央的动摇，日益暴露，尤其到长沙许克祥反动（马日事变）的时候，更加明显。武汉中央的反对土地革命，到马日事变就已经是公开的向工农民众宣战，开始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同时，革命又在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

级压迫之下，于是整个国民党公开的反革命事业便完成了。

二、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左派国民党的时期

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南昌暴动——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其结果是失败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大，同时因指导机关的策略错误。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时期。——于是广州暴动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三、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中国革命虽然最初有很大的发展，始终遭受了失败。革命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没有充分的力量战胜当前的许多困难。这些客观的困难和原因之中，应当说到：

四、一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强大

一、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力量强大。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力量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帝国主义利用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做些小小的让步，威逼利诱的分裂民族的联合战线，用贿赂军阀的旧方法，用武力的炮舰政策压迫革命，实行经济封锁，利用自己的强大的威力（银行、公司、军舰、军队等等）——造成阻碍中国革命发展和胜利的最严重的困难之一。

五、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

二、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联合战线。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初期是参加革命的，这一事实早已伏下他必然要退出革命战线的叛变。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暂时削弱了革命的势力，而加强了反革命的联盟。

六、三是地主领导的军队力量很大

三、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的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很优势的武力，许多地方这种武力是足以决定胜负的。革命曾经利用这种军队，可是这些军队的军官都是豪绅地主的代表，他们的兵士群众大都是久已脱离了生产的群众，和工农的联系比较很弱。当时军队，还是豪绅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驯服的工具。

七、四是工农发展的不平衡

四、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或上海三月暴动时）。中国工人阶级本来组织太弱，又是很分散的，他的力量并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的舞台，首先受着反动的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的赞助。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再则，地域上革命的发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已开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时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解放运动的尝试。这种情形，当然使资产阶级、封建豪绅的反动更加容易实行自己的任务。

八、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五、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半封建土地关系有密切联系，并且和外国资本有相当关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当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土地革命急剧进展之中，这些小资产阶级日益动摇，而终至于投降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里去。

（七）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革命性质的误解和联合战线策略的误解

然而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先锋的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当革命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这样，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指导机关，就使中国革命受着不可免的失败。

二、无独立性无批评性，只知让步政策，阻碍阶级斗争
和土地革命，竟是自愿的断送革命之领导权

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争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益，所以在紧急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而反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都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尤其是马日事变时的政策，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表现。

最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样也便使英勇斗争的工农，竟致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承认：当时共产国际超过中央委员会，直接号召中国的党员群众要求彻底变更党的路线，改变党的领导机关——确是对的。

（八）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

一、八七会议是布尔塞维克化的开始

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他在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八七会议用布尔塞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党员群众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分，改变旧的指导机关，——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

二、八七会议对于国民党问题的错误与土地问题的不彻底并不能减少他的意义

固然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可是这种缺点决不减少八七会议在历史上的极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八七会议的主要决议完全赞同。

三、十一月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但对于盲动主义未能充分预防

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要更加详细深切地确定土地问题的策略，提出苏维埃的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坚决的决定改造党的组织及引进工人同志来负指导工作的责任。同时，第六次大会认为：十一月会议指出准备好的联络好的武装暴动之必要是非常对的。但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议决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的采用了“无间断革命”的名词，于是解释革命为不断的高涨之可

能，由此而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暴动政策的观念也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以成为盲动倾向的根据。因此，没有能严厉的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很有害的）。

（九）南昌、秋收及广州暴动之意义

一、这些暴动决非盲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尤其是广州暴动，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政策。

二、南昌暴动指导机关的错误

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暴动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

三、秋收暴动政策取得农民群众，但是机械的运用这一政策亦发生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

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的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但是秋收暴动政策之机械的应用，亦就是有些地方发生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的行动。

四、广州暴动开始苏维埃的时期，但他的失败使他成为“退兵时的一战”

第六次大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所指出的

广州暴动之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广州暴动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为保障革命胜利之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客观上广州暴动在革命失败的过程中成为“退兵时的一战”。

第六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很正确的指出暴动时的错误：工农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反动军队之中的工作也是如此；对黄色工会群众的态度不对；党部与青年团自己的准备暴动工作不充分；政治上调动群众还太薄弱（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等）。第六次大会认为这些错误，也是暴动不能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究研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

五、广州暴动后党的政策没有能及时转变，以及反盲动主义的斗争未能充分，这由过于估量革命敌人的崩溃

广州暴动客观上是革命失败的过程中“退兵时的一战”，但是这一点我们党的指导机关没有估计到。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的失败的关系，工作的方向必须坚决的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方面来。必须集中注意于战胜盲动主义的倾向，更加要加紧党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更加要消灭对于工人阶级及一般群众的命令式的强迫方法。当时指导机关没有充分看清这一点，他按照这一方向进行的办法，很明显的是不够的。——因为对于帝国主义及反动力量看得过小，相当的过于重视了农民运动的胜利，对于革命的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在这种关系上不估量环境的两湖暴动等计划，就

是错误的。

四 革命运动的现时形势与 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

(十) 革命高潮过去后的形势

一、革命高潮过去

工农运动的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都遭着屠杀，工农的先锋遭受很大的损失。

二、现时没有革命高潮与工农革命发展的不平衡

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亦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农民的游击战争此起彼落的向前发展，并且还只在散漫不集中的状态之中，军阀军队崩溃的形势已经开始显露；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的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削弱——因为他比其他革命势力，所受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打击最重。

三、帝国主义实行瓜分政策

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因为工农暴动被镇压下去，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巩固了些，加强了些。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四、帝国主义现在比中国革命的力量大

瓜分政策的目的是：一是要用非经济的强暴力量，实行殖民地的经济剥削，而完全消灭中国的革命；二是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同时，列强即在加紧争夺中国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要剧烈起来。

五、太平洋将有瓜分中国的大战，但是现在列强之间还有如此剧烈的冲突

因此，就发生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中国的沿海各省，将要成为战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便是争夺中国的市场，要求重新瓜分，以求适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新的关系。

同时，虽然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极巨大的矛盾（日美冲突等等），然而帝国主义现在的力量仍旧比中国革命强大得多，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只要对于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稍有危险，他们就要联合一致的反对中国革命的。

六、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之间虽有矛盾仍能一致压迫革命资产阶级转到反动营垒，使反革命的力量大加团结，加强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及军阀地主等的势力，因此对于工人阶级能够加以严重的打击。

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的等等），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

（十一）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之意义

一、中国反动统治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革命的新的 高潮不可避免

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

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进攻：

(一) 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能解决了的；(二) 帝国主义者决不愿意轻易的抛弃自己的对华特权，如租界租借地关税管理权等等；反动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不能得到真正的集权和统一；(三) 工业经济的危机很难找到出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极小限度的改良，也是非常困难，殖民地地位上的其他种种困难非常之多，定期的农业危机，更加厉害，于是原料食粮的价格不断的高涨，劳动的后备军更是日益增加，使工业和工人阶级受着极大的压迫；(四) 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没有空余土地可以对雇农佃农略略让步，因为中国的小地主是占极大的优势，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租都不能接受的；(五) 统治阶级之间继续着冲突，军阀混战不息，将来这种混战不但可能，并且不能避免——虽然表面上现在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

二、国际形势能够帮助高潮的生长

革命潮流生长的助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日益剧烈，这就更可以解除中国革命的束缚。此外还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生长以及中国邻近的殖民地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印度)。

三、新的高潮的象征已见，但不可过份的估量

第六次大会认为：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

经有复兴的现象。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的消灭，自动的从下层组织起来，这都表示工人阶级觉悟的深入。再则，反帝国主义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并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分。

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的，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的现象。

四、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要表现他的决定胜负的力量，而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

（十二）争取群众的任务

一、新的高潮中要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

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暴动，认作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唯一出路。

二、现时全国范围内只要宣传武装暴动的必要以准备新的高潮

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现在要在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之中，使群众了解，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就决不能改良群众的生活状况。并向群众进行不断的宣传。

三、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线

现在第一个革命的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的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还要加紧的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

四、党要加紧日常斗争的指导

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里的冲突，农民与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长官在军营中的冲突，——无论如何琐小的冲突也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这些阶级冲突，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面来。党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强暴行为，利用反动派对于民众的一切屠杀压迫（当然不是每次号召武装暴动），扩大群众的反抗。使自己在将来高潮的时候，便成为革命运动的唯一指导者。

五、准备武装暴动正要争取群众

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为

执行这些任务，就是新的革命高潮之必须前提，也就是将武装暴动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之可能的前提。

(十三) 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

一、党与群众隔离的危险就是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

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政策，要看党内能否消除极左倾向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式命令群众的错误倾向而定。

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二、盲动主义是不顾群众不顾敌人的力量少数人的军事冒险

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的实行武装战斗，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当然亦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坏的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暴动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的准备暴动，而无往不是暴动，否认日常经济政治部分的斗争之准备工作的必要。盲动主义实际行动起来，便是少数革命“党人”的暴动，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当然，这种盲动往往要强迫群众去武装暴动，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丧工人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

三、盲动主义是游民无产阶级的意识

盲动主义是代表非阶级化的分子：乡村及城市的贫民（失业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开始加入革命的雇佣兵士，这是他们的意识和实际行动的

表现。所以盲动主义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这是与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反的。

四、党应当使贫民半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加入革命

同时，共产党不应当轻视这贫民阶级，他们在革命之中是很大的很有势力的力量。党的任务是对于这些贫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组织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尤其对于城乡的半无产阶级，应当如此。党应当努力吸引这些贫民分子，使他们在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加入总的革命运动。不过党应当日益加紧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

五、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也要反对

盲动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危险倾向：有些党部的一部分，就是在其他问题上，也有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基础，而倾向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无产阶级的见解。例如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有不正确的观念，错认平均财产是社会主义（在乡村中平均田地，在城市中平均货物），还有主张烧毁城市的倾向，在有些农民战争之中，也曾表现出来，甚至轻视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对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党内这些倾向都应当严厉的反对。

六、命令主义使群众离开党

此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还有命令主义的实际工作方法。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简直会成为绅士式的国民党式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的指挥群众，强迫群众。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

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不动。

七、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的任务是不能并存的

甚至职工运动之中，也就应用这种方法，到处命令，以命令委派工会领袖或指导机关，大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于是不去造成群众的干部，以至于征求党员及进行职工运动时也采取联络工人某几个领袖以影响其群众的方法，于是真正的群众工作，便受着非常之大的障碍。

党内的组织问题上，也有这种倾向，就是党内民主主义的异乎寻常的缩小（并非完全因为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官僚化，对于党员群众也是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如果不能坚决的完全的肃清这种命令主义，党便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能指导群众的党，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

八、对小资产阶级政策之正确可以使党不再受机会主义的危险

过去的经验，使党应当战胜极左派的情绪和国民党式的命令主义。现在，却仍旧可以发生对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不正确的倾向。

党的任务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党的任务之中，对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反抗军阀税捐的斗争，也要引进农民私有者（自耕农）群众的参加。对于这种策略的误解，可以发生更不好的倾向，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时候，对于乡村中的富农过于让步，甚至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关系上又要阻止工人及城市贫民的革命运动，以至于名为保存联合战线，而实际上失去领导权，使这些运动服从小资产阶级的指导。

九、联合小资产阶级富农反对一切反动势力，但是同时

要知道领导劳动者反对一切的剥削者

当工人店员的利益与城市店东小资产阶级剧烈冲突的时候，或者乡村贫农中农与富农相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的方面，而反对剥削者的阶级。

十、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错误倾向

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主要的作用；忽视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去力争领导，是异常之错误的。况且，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中（苏维埃阶段），阶级关系已经与五卅的时期完全不同。革命的深入使将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推翻军阀的斗争，——一定要发动更多更广大的群众，一定要激起加强几十倍的剧烈的群众直接行动，——这种前途更不可以忽视。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其将来广大下层群众的反帝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对国内反动阶级之前途，——这是极大的错误。

十一、对于农民革命作用之忽视亦是极大的错误倾向

再则，阶级斗争激烈分化的过程之中，彻底的土地革命的过程之中，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因此，忽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同样，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尾巴主义，——亦都是极危险的倾向。

上述这些倾向，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均产主义，让步主义，忽视反帝国主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都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十二、反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斗争都是反机会主义的继续

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是从反对机会主义的指导

机关及反对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得来的。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所谓左倾的这些危险倾向，也只是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别一方面，影响到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

五 党的任务

（十四）党内工作问题

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斗争力和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的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

二、积极的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当然要注意纠正这种问题上的几种偏见和不正确的倾向。

三、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

四、肃清党内一切纠纷，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因为这些倾向是损害党部的统一，减低他的战斗力。取消所谓“惩办”制度，对于工作有错误的同志，如果不是有系统的有路线的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应当纠正他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凡是同志做了错误，他要是能纠正过来，应

当使他工作而表现他的改正。

五、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研中国革命过去几个时期的经验。

六、加紧宣传武装暴动策略的正确观念，宣传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的任务。

（十五）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及职工运动的问题

一、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自己积极的赞助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信仰共产党而且自觉的接受党的指导。更加充分注意职工运动，尤其是产业工人，这样才能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二、为实行这一任务起见，必须立刻纠正旧的错误观念，对于党与阶级关系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便是仿佛认为党是站在阶级之前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帮助阶级，可以命令阶级，而不知道党只是工人阶级自己之中最觉悟的最先进的一部分。

三、坚决的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反对强迫罢工，强迫举行武装斗争的办法，大会认为这种办法，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的。

四、最大限度的努力，要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去。对于真有群众的工会，即使反动的，党员必应当加入进去，以达到争取工人阶级群众的目的。

五、有系统的各方面的努力工作，使工人群众最终的脱离对国民党的幻想。详细的对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教训，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

六、凡此一切工作，都是争取群众的必要条件，都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去实现，纠正忽视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倾向。要十二分加紧的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

(十六) 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任务

一、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

二、战术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

三、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去联结乡村中的农民运动与城区中工人阶级的斗争。

四、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的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

五。加紧注意农民的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农民的秘密结社等等），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组织之中的指导作用。

六、赞助并领导农民群众的部分要求，抗税抗租抗债以至于减租等等，以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

(十七) 苏维埃区域中之党的任务

过去许多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以党代表苏维埃的错误倾向。今后的任务是：

一、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

二、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

三、彻底的实行土地纲领。

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

五、坚决的肃清反革命的阴谋，彻底的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六、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业等的财产），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可是要知道店东小资产阶级的怠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

七、最大限度的保障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络。

八、当苏维埃政权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彻底的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要尽可能使工人群众积极的参加苏维埃，要实现苏维埃中无产阶级分子的领导权。

（十八）反帝国主义斗争与反军阀斗争

一、积极的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领导，引起极广泛的工人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来参加；暴露赞助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罪恶，联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积极的领导兵士群众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实行反对军阀的严厉斗争

二、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

下，力争革命工会的存在，无所畏惧的争取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的实行这种自由。

三、运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口号，反抗军阀压迫的口号，要求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实行反对高利盘剥的斗争（组织信用合作社，生产及消费合作社等等运动）——使大部分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及劳动者，游民无产阶级等等，离开国民党及民族资产阶级。

四、赞助店员手工业工人艺徒苦力的经济要求，组织这些城市贫民的小资产阶级，宣传他们，使他们组织上与无产阶级联络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之后，会有由社会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产之必要。

（十九）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

一、国民党的各派完全是反动的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赞成中共十一月会议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决定，就是认清他们都是反革命的派别。他们代表买办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汪精卫的左派，张发奎陈公博等，也是一样的反革命，在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期间，这一派完全变成法西斯蒂派。他们表面上左派的空谈，实际上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投降豪绅资产阶级，而实行对于工农的屠杀压迫政策。

二、准备推翻国民党的各派是党的总目标

（二党对于国民党主要的任务，是要准备推翻他的政权。现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争取群众，使他们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同时亦就要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反革命罪

恶,不断的尽量的攻击,对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权,尽可能的加以打击。要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足以损丧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就是准备推翻国民党的方法。

三、反对第三党等类蒙蔽工农阶级意识的党派

(三)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现在在阶级力量“两个极端化”的条件之下,阶级矛盾非常剧烈的情形之下,这一类的“政党”,既没有广大的群众,就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例如“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和工农政策”等等,他们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民族运动之中的动摇犹豫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

(二十) 军事问题与兵士运动

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武装暴动的军事技术之准备又非常必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都使共产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

党的任务是:

(一)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提出兵士应当得到土地或工作,“改良兵士底生活和待遇”等等口号,去发动兵士的群众斗争。

(二)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

(三)最大限度的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尽可能

的建立工人自卫的秘密武装（纠察队等）。

（四）训练党的军事人材，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

（五）加紧与军事有关的工人之中的工作（兵工厂等），加紧交通工人的工作，使这种工作与军事工作发生一定的关系。

（六）开始有系统的破坏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工作，特别注意印度、安南等的兵士运动。

（二十一）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问题

第六次大会为加紧与各国兄弟党密切联络起见，第六次大会认为必须：

（一）实行互相经常的报告自己工作及革命运动之发展。

（二）中央委员会派遣负责代表团赴主要的各国兄弟党，以便决定密切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共产国际其它支部赞助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三）委托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对于各国兄弟党赞助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不充分的问题，严重的提出讨论。

（四）巩固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络，与之共同一致的反对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共同进行破坏驻华的日本军队的工作，鼓动日本兵士转到革命方面来；并且共同决定实际办法，以进行中国境内日本企业（如南满铁路之类）的职工运动。

（五）要求英法美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选择充分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实际破坏列强驻华军队的工作，加紧在各国宣传赞助中国革命，暴露各该国帝国主义政

府的侵略阴谋。

(六) 此外，关于安南的职工运动与法国安南共产党的关系，南洋群岛中国工人运动与马来群岛共产党（爪哇共产党）的关系，蒙古问题与蒙古的革命党关系等等——都应当要与各该国共产党讨论实际的互相联络的办法。

(七) 经过赤色职工国际与国际红色救济会，加紧与各国革命工会及世界一般的劳动群众联络，使他们能够加紧对于中国革命及群众组织的赞助，尤其要扩大反对中国空前的白色恐怖之宣传。

(二十二)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的方针。

选自《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会议通过)

中共党的六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综合全党同志的意见，依据历年来斗争的教训与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决定了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一年来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的变迁，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以及中央根据此路线而执行的一切工作，都在实际上证明了六次大会路线之正确，并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中央回国之初，即表现对六次大会决议的怀疑，对大会结果的不满。中央当时曾对陈独秀有过详细的解释与批评。

不仅在六次大会之后，更远在“八七”会议时，当时的中央曾根据国际的决定，屡次要陈独秀前往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独秀当时不仅不服从国际决定，且于同志间谈话，表露其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彭述之彼时在顺直省委工作，亦曾有不满意“八七”会议的宣传。嗣六次大会召集，国际及中央要独秀前往参加，且曾几次催促，但都遭拒绝。六次大会中及大会后，国际又曾数电促独秀赴莫。新中

央继续向独秀解释他赴莫之必要，但他初则应允，继则取消，终则推延到明年开春。其实这都是他表面上的应付，他中心意见在他最后致中央的两封信中，已完全表示他反国际反党反中央的一贯路线出来了；他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他根本便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地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堕入到更深的机会主义。

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联合进攻苏联，中央在此紧迫时期依据国际与中国党的六次大会决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的口号。动员全党同志，号召全国无产阶级，农民与广大劳苦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陈独秀等不特不在中央的决定之下一致工作，并且离开中央的路线，提议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在分析中东路问题之前途中，更认定“一是帝国主义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联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必然互相争夺中东路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见解的结论，除掉落后的群众会主张苏联退让外，便只会得出如独秀致中央信中所说“无论那一种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于是我们只要反对战争的祸害好了，不必去问战争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进攻苏联，还是帝国主义自己互打，所以“误国政策”的根本观点，即是产生于此。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对不相容的，必然要在群众中间散布起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幻想，必然要落入资产阶级

左派的泥坑。他这种见解，完全表现他仍然固执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路线，一点也没有接受六次大会的决议与精神。中央对于他的两次来信，曾在理论与实际的各方面，指出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之危险，并告诉他在这样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必须放弃这种错误思想，回到党的路线之下来一致行动。

陈独秀对于中央这样的指示，完全拒绝，且更进一步提出与国际及中国党的六次大会根本不同的路线，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他认为过去大革命时代的机会主义错误，乃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和加入国民党”，乃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而不是当时他所领导的机会主义中央不执行国际正确策略的错误。他认为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了，“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残余……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由此便得出“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之取消主义的结论。于是他完全站在反对六次大会的观点上，认定“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因之他同彭述之便认定“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策略上更攻击中央所领导的五卅与八一在上海的示威是玩弄，是盲动，而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

这表示他已经从机会主义深入到取消主义，已经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堕入到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场去歌颂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之“稳定”（？）的统治。这与脱洛斯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思想，完全是一致的。这样极端右倾的思想，这样反国际反党的路线，如果在党内存在，毫无疑问地是破坏党，破坏革命，以至背叛阶级帮助敌人。

并且他在行动上，更于中央未决定与答复以前，便将他写给中央的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并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脱离。这很显然是反党的小组织行动，并且是第二党的萌芽！中央在开始，是坚决地与他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并于十月五日通过了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脱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可是陈独秀完全不接受中央的警告，并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脱洛斯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布尔塞维克党决不能容留这样永不真实地承认自己错误与接受国际和中央决议，公开的与国际开除的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党内散布叛变无产阶级，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许有这样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在党内存在，因此中央特决议：

一、开除陈独秀党籍。

二、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固执与陈独秀一样的错误意见，经过支部区委省委与之作详细的讨论和批评后，

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积极作小组织的活动，煽动同志反党，破坏支部开会。因此，中央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他们四人的决议。

三、各级党部须严重注意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如果发现了这样小组织的存在，须根据党的最高原则，立即予以解散。对于这种小组织的领袖分子须坚决地开除出党。参加活动或接受这样错误思想的同志，须有详细的解释和批评，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经过多次教育以后还固执他的错误思想与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去。

布尔塞维克党能够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完成历史的使命，就是因为有他的宝贵武器——一致的精神与铁的纪律。服从大会决议，服从指导机关的指导是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原则。如果破坏这样的原则，如果个人或少数人不同意大会的决议，不同意国际和中央的指导，便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行动，这便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这便是破坏党，破坏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对这样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才能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斗争的力量。

“谁愿意稍稍削弱无产阶级党的纪律，谁就是事实上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左派幼稚病）。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党的铁的纪律来巩固无产阶级的阵线。现在党内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阻碍党对于取消主义的斗争，帮助机会主义——反对派在党内发展，松懈党内铁的纪律。且这种调和倾向，根本便伏有右倾成分，如不彻底肃清，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与机会主义走同一的道路。因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同时要坚决反对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倾

向。

党的巩固是建筑在党的统一的意志的基础上，“肃清党内机会主义的分子，不只是不会削弱了党，而且是加强了党：加强了工人运动与革命。”（列宁——虚伪的自由论）尤其在现在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党的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捣乱，毫无疑问的是帮助了敌人，如果不肃清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开除这些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领袖分子，决不能坚强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起来为党的统一的意志而奋斗，为共产国际与六次大会的路线而奋斗，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脱洛斯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肃清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肃清一切调和派的倾向，拥护中央的决议，拥护党的铁的纪律！

中 央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 录：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陈 独 秀

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谓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间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的机会不同，遂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长社会，东方之封建军阀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资产阶级社会，俄国之无产阶级社会，同存于今也），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简单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经济组织而为社会一切组织进化基础的缘故。

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较速的西欧民族隔绝这两个原因，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政治的现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覆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

明代西方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铜墙铁壁都被它打开，封锁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驱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纲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们喉咙叫得多么响亮，可怜终于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变化的必然现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终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刚毅辈无论有何威权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经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资本民主派富强维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

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满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论。当时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两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换句话说，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质上可说是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资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们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两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现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

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能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的站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

的革命分子，挺身而出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

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维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唯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他们为做官抓钱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没有困难艰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调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蠢贼，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资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

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

（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选自《向导》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中国国民革命与各阶级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陈 独 秀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份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他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

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倒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命运。例如在欧战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

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像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戴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君及贵族，

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动摇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是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

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

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

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

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斗争，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斗争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斗争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斗争。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斗争，只是一般的政治斗争，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斗争，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不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斗争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

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萎靡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阵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動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倒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

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广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

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选自《前鋒》第二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出版

第三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

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五〇九页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六二页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九九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

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五〇六页

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七三页

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的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维埃运动得着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

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要使革命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胜利，不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的工具，即敌人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八——五九九页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

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六——一三一七页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九十五页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七十七页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新县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份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十九页

“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六八——六九页

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九三页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九五——九六页

附 录：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
扩大会议通过)

一 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观的革命形势

本年八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已经考察武汉七月反动之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断定那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稳定，在现时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时指明：一般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危机，因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大大的扩大发展起来，这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

中央曾经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受着两次巨大的失败，四月间沪粤的反动，七月间武汉的反动，然而中国革命决不会就此长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认为这种悲观的观念是绝对不正确的。中央那时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深入革命的斗争，并且要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以后的政局，完全证明中央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对的，固然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固然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得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但是革命虽然又遇着了这几处部分的新失败，然而三个月来一般的斗争经验，更证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对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

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察现时的新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

二 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经济

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虽然胜利，然而那些产生伟大的中国革命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仍旧存着。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遽起来。这就是因为得着胜利的反动势力，竭力在那里巩固中国的旧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是陈旧腐朽落后野蛮的制度，于是这种情形的背景里，那一般的总危机便尽量地大大开展起来。这就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的广大群众之革命斗争的高潮。

农业经济的衰落破败，一天天的更加带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质。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当的“丰年”（除直隶、山东两省已经完全被战祸天灾所破灭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时，照例应当使农业经济相当的改善，但是事实上差不多全国都因过去的灾荒与战祸，同样是成千累万的人饿死杀死，不过是比灾歉的直鲁略好些。），可是这所谓“丰年”，不但没有阻止些农民经济的崩败，而且更加增进农民经济崩败的过程。因为“丰年”的结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钱米租费给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借口丰年迫缴历年欠赋），地主和重利盘剥者要追取农民的旧欠，买办和商人要抑低农产品的价钱，军阀更借口增加税捐至两倍三倍（江苏今年增收田漕的亩捐）。所以所谓“丰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农民破

产，至少也和荒年一样。地主的剥削农民，商人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军阀的掠夺农民，豪绅官僚等等的压迫农民，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弄得农民不但不能恢复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于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已经被这些有产阶级剥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农业经济的“重复生产”，即使在极狭小的范围内也简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直接剥削外，军阀还要掠夺农民，他们不但征发粮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则因为战祸连年的关系，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国家秩序混乱分崩，天灾日益频数（这些天灾亦大半由于中国社会制度而来的），还有财政金融的紊乱，使乡村中多量的出产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报酬，商业和市场的停滞纷扰，使农业经济上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日益破毁，乡村中土匪蜂起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农业经济崩败衰落。农业经济的危机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趋势，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剧烈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三 工商业的危机

中国工商业及金融中的危机，尤其有明显的表演。中国革命客观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造成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任务，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中就应当解决的。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走近解决这一任务的一步，而且更加使这一任务的解决远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但增加中国的分裂离析，而且发生许多新的

混战，各省之间有战争，每省之内也有战争，现在全中国都是混战。商业交通在各省之间固然是时常断绝，就是在一省之内也往往东阻西隔，各省都是紊乱的金融状况，原料机器燃料的运输减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简直断绝了。反革命的屡次政变之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势力又增加了好几倍。再则中国农民的家庭工业，手艺等类的事业，更加破产停滞。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输入减少百分之五十）。外国资本利用银价的低落，财政的紊乱及国民党的屈服，更加在中国多量搜刮金钱财货。全国的破产穷困，经济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堕落下去。几百万农民，几十万工人店员，都在失业，都从商业及一般生产过程之中排斥出来。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就是如此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四 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

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完全降伏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增加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实际上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统治了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得着了绝大的胜利，满洲、内蒙正在变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过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

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从革命开始到现在，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统治力，从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的。伟大的中国之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阶级向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投机事实”的对象，但是从没有现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国民党）治下这样厉害的。

五 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

国内政策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便是只能采取法西斯蒂主义及亚洲式的野蛮专制之凶恶手段。白色恐怖，穷凶极恶的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劳动民众，这种反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治下，达到了空前的野蛮程度。中国旧式的野蛮毒刑，对于革命党人的非刑拷打，还要加上建立黄色工会的把戏和警察包探所组织的工贼性的“工会”，渗入工人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日益增长同时他自身之内的分化崩溃的过程却也在急转直下的前进，中国资产阶级，固然绝对没有能力实行反抗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反动的革命使命，而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能力做稳定团结反动势力的动力。对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他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国家，或者就在资产阶级地主联合的基础上统一中国，都简直是他没有丝毫能力去实行的事。这是他历史上的命运。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其结果是使中国更加分崩离析，使割据互争的局面更加纠纷，自然要造成继续不断循环不息的军阀混乱的屠杀战争，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一切建立巩

固的国家政权之尝试，就算在一个小小省县的范围里罢，都是完完全全破产。无间断的屠杀混战及空前的贪婪淫佚腐化，——便是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国家机关之致命伤。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堕落，完完全全变成无主义无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狗窠，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党，贪赃舞弊杀人凶犯投机奸商的官僚党，这事实很明显的反映着资产阶级反动的全部腐化崩败的景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八月间便预言：国民党要变成一个象样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党，尚且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很对的。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本党认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本党不但要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而且要努力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压迫民众的罪恶，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

中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的流产，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不能造出一个有一定政纲的党，更不用说他要造出一个真有政治意识的政纲了。

六 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特别的作用，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完全没有稳定的可能。经过革命的三次失败，仿佛反动稳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须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够由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一些，同时，必须在现时国际国内之中，有渐进的、作算是非常迟缓痛苦的改变社会制度之可能，可是实际上现时在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

个阶级，能够负起责任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不过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蒙蔽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领导权到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刻便不得不将他转交给豪绅地主阶级，就是完成反革命势力的复辟，结果是反革命的领导权仍旧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而不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汪精卫等类的政客，想“改良”土地关系（如应允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可是这种政策在几天之内便完全破产，单是这一例子便证明改良政策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再则全世界客观的形势是革命的，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又在急进的施行，这种情形也就是使中国没有由改良主义得着外国资本家的帮助，而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要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使中国完全永久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二）帝国主义战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战胜苏联。此外中国不能由改良主义的方法去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失败，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

最近几月的经验，铁一般的证明这件事。中国伟大的革命已经唤起如此广大的工农苦力群众，他们都起来实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民众激愤的革命力量，决非几个月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所能完全扑灭的。

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

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总之，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七 革命的高涨与低落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九月间农民暴动普遍广东湖南。虽然这种互相隔绝的群众自发的暴动，遭着屡次失败，然而农民运动的爆发仍旧继续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于更加厉害起来。十月间农民暴动又在江苏、直隶、热河、山东开始了。同时几个主要的无产阶级区域，如上海、广

州、武汉，经过一期退落情形之后，工人运动又带起比较猛烈的革命性质。农民运动的潮流，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爆发，不过暂时还比较的弱罢了。南京与武汉军阀争夺地盘的屠杀战争强盗战争开始之后，劳动平民反加受着痛苦，广大的工农群众更加愤激。虽然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非常之严重的压迫屠杀搜捕，然而群众的革命斗争，却正在刚经失败损伤的地方，陆续的继起。群众正在自己失败的经验上，学习革命的斗争。

固然，过分估量革命的高涨及群众的革命力量组织力量，因而认为可以有大大范围内立刻的胜利，这是错误的；然而经过革命三次大败之后，在现今这种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重新爆发；如果对于这种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

因为革命潮流的低落条件，至少是：（一）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二）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三）革命群众之溃散与消沉。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惶失措而拚命的严厉镇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布尔塞维克的党，不去积极发动群众，领导革命潮流的发展，而以为自然的革命高潮到来，自会胜利，那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 现时的总策略

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暴动与农民暴

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中国共产党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那是会变成拚命的“孤注”的，然而党应当去领导一切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发动。所以共产主义者应当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充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固然，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是农民群众常有的倾向，本党尤当领导这种斗争，使适合于战术上的目的，袭其不备，夺其武装，杀戮豪绅，摧毁其各种权力机关。但是，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

至于城市之中，则游击战争的策略，比较起来要难实行得多，所以往往城市之中有不适宜采用这种策略的时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经最终决定举行暴动，巷战已经开始，那时，党才可以运用这种游击战争的策略。然而现在在一切工业区域，已经要建立工人的武装队自卫队，训练战术，利用他们在日常的反抗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这已经是工业城市之中现时所不可迟缓的任务之一了。城市暴动的必须条件是：（一）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涨及革命情绪——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二）治者阶级统治之动摇

崩溃的形势；（三）一般市民（中层阶级）的慌乱犹豫动摇，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于同情于治者阶级之颠覆；（四）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之组织，技术上的准备。因此，党不但不应当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谓军事工作之准备，而忽略各市以及各县工人手工工人店员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之指导与发动，而且应当更加加紧这种斗争，每一次极小的斗争之中，也要引导工人群众去了解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及与农民暴动联合推翻统治阶级之必要；这样，于是切实的在政治上准备城市之中暴动。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但是，这种联络，只有经过党的组织与规定计划。群众的暴动，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要适合当地的环境与时机，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没有立即暴动的形势中，而以军事投机的方式做军事上的互相影响。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再则，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下，可以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军事投机主义，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固然是军事投机主义，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只知道军事上的布置准备攻守进退的规划，因

此，暴动之中只见军事的行动，并不充分发展群众斗争的根本工作。二是借口准备的不充分或者采取等待政策，而不发动当地的群众，甚至群众已经多数的起来暴动，尚且对于领导这种暴动仍旧是怠工或动摇犹豫，这种倾向的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发动群众的政策，甚至限止群众自发的斗争，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政治生命。党对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应预先指出他们的危险性而努力扫除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暴动的责任，固然是使他尽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组织性，但是，一切群众自发的斗争，即使是党所认为过早的，党也有起而领导之责任。

最后，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一般贫民苦力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尽力吸引他们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党不但要努力去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而且要去领导贫苦农民，领导起潜伏待发的暴动，发动游击斗争；应当发动工人的阶级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领导他们汇合而成总暴动，获得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胜利。

九 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

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

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党应当在文字口头的宣传上，对于最广泛的群众解释：“为建立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而实行革命斗争的必要。”（“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但是，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这所谓“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是说暴动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只要暴动真正是发动群众的，那么，暴动胜利时，这便是事实上不能不执行的任务。至于游击的农民暴动，还只在袭击移动的时候，当然，那组织暴动的当地革命委员会，继续以临时政权的性质为暴动之指导机关。总之各地农民暴动的发动，应当以当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农民协会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员会来指导（城市暴动便是工会等推举的革命委员会）；应当尽量发动群众，引进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实行游击式的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划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如果已能占据城市一县或数县，以至于一省，工农暴动已经联合起来而获得胜利，那便有建立苏维埃之必要。城市中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广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城市暴动一开始，甚至尚未开始之前，已经要有群众斗争组织的雏形，如同盟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等，要积

极领导这种群众斗争的组织，使成为革命的暴动的中心机关，实行革命暴动独裁的机关。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便要变成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暴动的胜利，只有在建立苏维埃的过程中，能使工农群众真正自己获得政权，而更加尽量的来发展革命巩固革命的胜利。——所以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借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划。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工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

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的经济的组织）。然而党应当确定方针：暴动胜利之时，要农民协会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现时就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所以苏维埃口号并不与组织农民协会相冲突，可是“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当取消，苏维埃口号之外，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

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总方针，已经载在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之中。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犹豫圆滑的修改或谬解土地问题上的党的主张。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代替上述的革命口号。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苏维埃口号以外，还有劳动问题党纲：八小时工作制，绝对的增加工资，规定休息日，社会保险，要求监督生产等。再则，应当对于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解释，并且要在暴动胜利之时实行下列的事：例如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如建筑工人贫民住宅等。只有在这种革命的口号之下，本党才能组织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

十 反对军阀战争与军事问题

反对一切军阀战争的问题，是中国现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赞成中央最

近所发反对军阀战争的宣言，认为对于军阀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是非常之对的。“失败主义”便是要使交战的双方军阀都失败，因为军阀的失败崩溃，就可以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环境，而使工农暴动容易得胜。本次扩大会议更特别的指明：失败主义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旧军阀战争的时候，对于本党是天经地义。对于劳动民众，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的统治是一样的。北方军阀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盘剥者，是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的代表（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权）；南方军阀是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双方虽然现在还是反动之中互不相同的种类，可是工人阶级及农民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本党的任务，便是在一切军阀战争之中，努力将这种军阀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将这种屠杀掠夺的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富豪军阀的国内战争。本党应当向劳动工农民众解释的，对付军阀屠杀战争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农兵士群众起来实行推翻自己当地的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革命暴动。本党应当组织群众以备暴动，在优越的时候发动群众而指导他们暴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夺取这些混战殃民的军队的枪支武器。

中央认为必须更加加紧在一般广泛的平民群众之中做反对军阀的宣传。“反对战争”的口号，中央认为是对的。但是宣传这一口号的时候，必须解释，要能永久消灭这种军阀的掠夺战争，只有劳动贫民的革命胜利，而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军队之中的革命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更加重要而更

加要加紧破坏这些军阀军队的工作。中央现时特别指明：虽然中央政治局屡次提及这一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到处受摧残，或者简直没有做。农民暴动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认为就是这一工作没有丝毫成绩的缘故。本次会议现时特别命令各级党部立刻开始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除主要的革命口号之外，军队中的宣传，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饷项，要求发清欠饷，给兵士好衣服好住所，废除肉刑，反对军官侮辱兵士，兵士监督军官的财政收支等等，本党应当号召兵士参加工农暴动，没收军阀财产，兵士选派代表参加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的政权。

同时，中央认为必须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总经验，尤其是屡次失败的教训，都证明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新军队中应当有集权的军需供给的机关。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

十一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八七紧急会议以来的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这种情形自然的结果，竟使本党以全力去指导无产阶级农民的斗争；在这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之下，本党所以没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上来。同时，正在这一时期之中，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保镖

的军阀（国民党）逐步屈服，实行其卖国的亲帝国主义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苦力群众赤手空拳夺回来的英租界，国民党竟归还了英帝国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耻辱。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经企图使盐务署的外国督办服从自己，但是英国领事几声抗议便把国民党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而国民党政府一句硬话也不敢说。所有这些事实都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是彻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进极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当领导中国劳动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严格的揭发统治者阶级的卖国行为，以及国民党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头禅。本党应当号召无产阶级及广泛的被剥削民众起来奋斗：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撤退外国海陆军，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中国人民公有，取消一切外债——满清政府及军阀政府零毫出卖中国所借的外债。

同时，本党应当经常不断的对工人及一般劳动民众解释：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统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同时，也只有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

十二 机会主义之遗毒

八七紧急会议虽然严厉的反对以前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半孟雪维克主义的政治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虽然屡次纠正地方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内仍旧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遗毒。叶贺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南昌暴动政治上意义的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政策，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只提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张减租到收获百分之三十，不注意农民群众的革命宣传，不准工农自动的独立的实行杀戮豪绅地主反革命派，抛弃征发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之政策等等）。军事上很坏的策略，也表现前敌党的指导，没有革命的建议力，没有果断的意志和方针。许多次的农民暴动之中，指导者犹豫动摇，没有革命的坚决的意志，都是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机会主义的特点，便是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去依据工农民众，而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总想做勾结杂色军阀的把戏。中央这次会议认为必须以全党的力量，来排除这种危险的致命的机会主义之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干部是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肃清其中的机会主义的分子。要知道最近两湖广东及叶贺南征的失败，其原因由于主观上的错误的占极大部分，没有强固健全的非机会主义的党的指导，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再则，本会议认为还要预防党内别一种危险倾向发生之可能，——这种倾向便是对于工人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部分要求的斗争，职工运动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实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不但和指导部分要求的斗争的工作不相冲突，而且更加要党积极的去领导工人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的革命的组织。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瞿 秋 白

(一) 革命是低落吗？

中国革命经过了三次失败：一、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的反动，二、七月间汪精卫的反动，三、十月初叶贺南征广东的失败。但是，中国革命是否因此而完全失败，完全消沉呢？固然，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之中，资产阶级几次陆续的退出革命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豪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扩大起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整个儿的国民党，从革命的各阶级联盟变成反革命的官僚政客军阀工贼土豪乡绅的党，所谓清党反共，便是从这革命联盟之中将最革命的力量排除出去，将工农阶级摈弃，所剩的只是一切种种的反革命势力，自然，国民党变成完全反革命的政党。固然，如今是这个反革命党攫取了政权和北方旧军阀分治中国，他们共同一致的屠杀工农摧抑革命，但是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何以呢？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时的中国必须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相当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逐渐稳定；三、革命的群众溃散而消沉。如今事实上中国绝对没有这些条件。再则帝国主义虽然利用国民党的反

动而逐步进击中国，但是他自身并不能在世界范围之内战胜社会主义的革命，——苏联的国家日益巩固，而且他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日益发达。帝国主义自相冲突没有能力协助中国反革命的势力稳定他的统治。

如今反革命的统治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与民族解放的问题：土地问题上，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及减低债息至百分之二十，算是国民党的改良政策，实际上丝毫不能实现，——豪绅地主正在当权，他们根本不许农民少交一粒米，少得一个利钱，他们遇见减租运动便动手屠杀农民，至少，他们也要退佃，使佃户根本失业，他们遇见减息运动，至少也要拒绝放债，使贫民根本没有法子度日。劳动问题上，就是极端改良主义的劳动法也不能实现，工人的工作时间正在延长，工资正在减少，生活程度日益低落，全国的财政金融大紊乱，全国绝大多数的工农贫民的革命需要只有更加剧烈起来，阶级斗争已经走到最剧烈的程度，成为公开的武装的斗争。民族解放问题上，关税不能自主，租界不能收回，外国资本的竞争不能遏止。——这都是显然的事实。

如今北方从直隶山东起一直到南方的广东广西止，不论是国民党也好，非国民党也好，是蒋介石派也好，非蒋介石派也好，都在军阀的纠纷冲突混战之中。每省都有若干派别互相争夺，互相战争。豪绅资产阶级的内部纷争，而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也是显然的事实。

再则七月间武汉反动之后，武汉的总罢工立刻便起来，九十月间鄂南湘东农民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安徽，无处没有农民暴动，最近，叶贺失败之后，广州工人还是直接起来奋斗，十一月初江苏的农民也暴

动起来。暴动的民众一动手便是杀戮豪绅没收土地，他们彻底的感觉到非自己拿着政权不能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一丝一毫，非举起武器来不能取得政权！斗争形式的剧烈到了极点，并不因为受到屡次的大损伤而消沉。这更是很明显的事实。

可见国民党虽然偷取政权而背叛革命，但是他并不能消灭革命。革命仍旧陆续的暴发，革命仍旧继续着。最近半年以来革命虽然受历次的打击，而已是很严重的打击，然而革命的发展仍是旧继续着。事实已经表示得很明白：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暴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

(二) 国民革命完了吗？

国民党偷取政权而变成反革命的政党，中国工农民众的革命潮流立刻便向着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道路。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完结了，从此开始了第二次的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呢？不是的。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还是取消国民革命已得的胜利，帮助着统治势力的复辟。“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任务，至少应当是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推翻封建式的剥削。如今事实上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立刻投降帝国主义，不但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废除，反而将工人所夺回来汉口九江租界都要交还英国；他们立刻造成千百军阀分裂宰割中国的局面，军阀的大混战的局面，中国不但没有统一，而且比以前更加混乱；财

政交通不但没有统一整顿，而且比以前更加紊乱，——绝对没有发展本国工业的可能；资本家地主对于工农的剥削更是日益加重，生产状况显然退化，尤其因为豪绅资本家的榨取利钱不能在发展工业方面去图谋，于是他们都只在竭力加重对于土地的剥削，买田买地，加租加税，——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不但不能废除，反而更加厉害。中国革命中民族解放及民权主义的任务，丝毫都没有解决，没有实现。因此，可以断然的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并没有完。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且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是懦弱妥协的，他一遇到民众的革命高潮，立刻便转入反革命的营垒。固然，他们想着以为可以用改良的方法，稍稍和缓工农的革命情绪，稍稍哀求帝国主义放松些侵略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工农的社会革命，同时还可以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但是这始终是幻想。中国资产阶级自己本身非常之薄弱，他们对于工人的待遇根本不能实行丝毫的改良，更不能劝豪绅地主改良土地关系，帝国主义也无论如何不能放松侵略政策。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业的不发展，自己大半和土地的剥削相关联，自己大半就剥削农民的重利资本，自身大半要倚靠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与民权主义的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勇猛的彻底的推翻中国的旧社会关系，彻底的领导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

所以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彻底的土改，本来是民权主义的性质；只有彻底

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

（三）中国革命只是民权主义的吗？

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基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何况工人阶级自身既是革命的领袖阶级，他便不能不在革命斗争之中，力争自身利益的保障，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最近一年来工人店员力争改善生活状况的斗争，其势不能不一直要求到监督工厂管理，参加管理店务之事实，便是证明；城市之中这种工人的斗争不能胜利，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到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何况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了已经十年，全世界是资本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对峙的形势。中国革命势必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结，而在

中国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所称为由民权主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实行。中国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像法国大革命似的；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

总之，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选自《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五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第四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李立三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区的三次“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一七九页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

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一〇——二一一页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〇一——九〇二页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九一——八九二页

参考文件：

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

(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
号召全党，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国际七月决议案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真正发动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进攻路线，最近国际来信又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和危害党的实质，要全党的布尔塞维克象一个人一样，一致的团结起来实行国际的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斗争。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这一指示下，深刻的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认为立三路线之为害于党已成无可争辩的事实。立三路线之历史的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而组织上陈独秀的家长制度又给立三路线的统治以组织上的保障，所以自中央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遂日益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遂成为中央的路线而统治着全党。从此直到三中全会，中央的工作是站在反国际路线之下进行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方针，掩盖着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引导党到消极和失败，而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的。三中全会本是为的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但因为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来接受，结果使三

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如说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中央路线在六月十一日后还是与国际一致等等；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在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直至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虽承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但在十一月二十五、十二月九日两决议案中，在中央告同志书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如首先肯定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国际路线，后来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发展二十五日决议等等；这都是不能斩断调和主义尾巴之不可容许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现在公开的承认这些错误，并暴露这些错误于全党，要从错误的认识中来确定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与执行国际路线的总方针。

二、现在政治上与党内的情形是怎样呢？首先是红军苏维埃区域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不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去建立和巩固真正的工农红军，不去建立苏维埃政府与实行自己的政纲，不去发动广大群众有步骤的争取在湘鄂赣省区一省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反而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结果造成目前苏维埃区域整个削弱与红军受了严重打击的形势。立三路线的指导是在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调和主义的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仍旧统治着，从中央以至各地仍在空喊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的口号，而并未实际去真正努力组织群众的政治经济战斗，去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因此，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及发动群众的能力大大削弱了，赤色工会的组织退步了，

党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大大削弱了，群众组织的独立系统受着障碍了，党渐渐脱离群众了，党的指导机关与党内群众也渐渐脱离了，青年团的转变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广暴纪念示威的失败，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证与总结。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党内情形也就呈现出非常状态：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打击了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同志，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几次反抗国际的决定和指斥，这就使最能保障正确路线执行的国际领导受到障碍，使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使党的领导走上一错再错的覆辙；——这是目前党内最严重的危机！

三、中央政治局在了解了自已错误与党内危机之后，特通告全党执行下列的决定，以实现坚决的布尔塞维克的转变：

1. 三中全会的决议与最近两次补充决议及告同志书是不能领导全党执行国际路线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的。要坚定这一斗争战线来执行国际路线，只有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在这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与最近来信是党的目前行动的根本方针。

2. 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根本的办法，改造各级指导机关是紧急的处置。在这里，必须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党内民主化而不妨碍秘密条件，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必须坚决的反对以派别观念对抗反立三路线的分子，而造成

掩护立三路线的小组织行动。这样，才能冲破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而开展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斗争。

3. 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这不仅解决党内问题，且要更进一步去解决一切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如党纲问题等等。

4. 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一长期艰苦的工作。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所以反立三路线的本身便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一切用各种形式来掩盖在立三路线之下的企图，党都须予以无情的打击，这不仅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且要有组织上必要的制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必须在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来真正实行实际工作中的转变，绝对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将国际路线解释成为退却的路线，尤其要反对托陈取消派利用这一时机来做破坏党的阴谋。

全党同志们！动员起来！要挽救目前革命进展中的部分失败与消极，要挽救目前党内的危机，全党同志只有团结一致地站在这一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立场上，来执行国际路线，来实现上述决定，这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新的伟大胜利。

附录：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李 立 三

现时革命斗争的发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严重的任务摆在我们前面。如果对于些这问题不能找到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解答，我们将会犯到可怕的严重的错误，甚至断送革命。我在最近几期的红旗上面写了一些短篇的论文来解答这些严重的问题。虽然是零碎的篇章，却还可以找出系统的贯串。又因迫于实际工作不能再作长篇论文，所以把它汇集起来，重行在布报登载，暂给这些问题以初步的原则的解答。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一)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帝国主义的统治失掉了中国，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三主要帝国主义日、英、美灭亡的到来。所以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主要柱石之一。

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一定要决定于国内的无产阶级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要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

中国革命的开始，不只是一定要遇到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马上要遇到更残酷的国际战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一战争只有，而且必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及全世界殖民地工农劳苦群众站在一边（无疑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这一战线的领导者），全世界帝国主义与全世界殖民地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站在一边，作决定各自寿命的最后的搏战。中国革命要在这一最后的搏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

如果有人拿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国民党政府可以用外交政策来缓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来比拟将来的形势，那么，他是完全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的转变——那时帝国主义还可以采用引诱中国资产阶级叛变的方法来消灭中国革命——与整个国际形势的截然不同，无疑的这样忽视对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是极危险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只有在与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大的援助与共同斗争的条件之下，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所以更加巩固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信念，加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取

得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强大的援助与及时的一致行动，这是准备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的条件，这是中国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而且是国际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严重的任务。

(二)

依据中国这样的客观条件，取消派的人们便得出了他最无耻的结论，“中国革命高潮，只有在世界革命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才有再来的可能，并且才有胜利的可能”。这样等待世界革命与帝国主义战争再来革命的观点，这不只是没有进一步的去了解国际与中国的客观条件，而且没有了解极粗浅的革命的各部分的力量互相推进的作用。遂形成了他“睡在李树下等候李子落到口里来”的最无耻的懒汉的观点。

帝国主义是中国主要的统治者，固然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决难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胜利；可是就帝国主义统治的整个世界来看，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是最尖锐最严重的地方，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束缚世界的锁链中，中国是最薄弱的一环，就是革命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而且这一爆发以后，必要引起整个世界革命的兴起。

中国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日美冲突最厉害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最严重的地方，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最易为尖锐化的地方——譬如现在

每次工人的经济斗争，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样一切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都集中在中国，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上革命来找自己解放的出路。这就是中国革命最易为爆发的主要原因。

假如中国革命要首先爆发，自然要遇到极残酷的斗争，极严重的牺牲，然而这是历史付与的伟大的使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有最大的决心准备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谁想逃避这样的使命为这样空前的残酷斗争所吓怕，他就必然成为取消主义者，客观上就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支持者。

(三)

目前革命形势无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条件，在全国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党的任务是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最严重注意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

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开始。根据上面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分析，更可知道一省与几省的政权的夺取，是有他的严重的国际意义。他不只是马上要遇到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马上要遇到残酷的国际战争。所以在我们准备这一胜利的条件的时候，必须严重注意这样伟大的残酷的斗争，决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儿戏。

我们要特别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要准备各种革命

势力的平衡发展，要准备全国的配合，而且要特别加强与世界革命的斗争联系，这都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世界革命浪潮的正在发展，无疑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可是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注意——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号召，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在准备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时候，要严重注意与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而且我们应当要求国际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注意中国革命问题，准备拥护中国革命伟大的争斗。

论 革 命 高 潮

（一）革命形势决定党的战略

党的主要战略，是要依当时的客观形势来决定；我们要正确的精密的去估量客观形势就是为着要确定我们的战略，与战略的转变。在有革命形势与没有革命形势时，以及在一般的革命形势和革命高潮时，无产阶级列宁党的战略是完全不同的。

六次大会正确的指出：“现时没有广泛群众的革命高潮，……武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将来新的高潮时，便应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

所以我们提出革命高潮问题是有严重的战略转变的意义：如果离开党的战略而斤斤于现时是否是革命高潮的争论，或者说“党的战略并没有什么不够”，而对革命形势又估量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名词的争论。这是十足的书生式的清谈，完全不是列宁主义者提出问题的方式。

(二) 革命高潮的标志

现时形势，无疑的是革命复兴，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可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确还没有表现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主要的标志。

对的，现时土地革命是有空前的发展与深入，生长了很多的苏维埃区域，特别是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工人斗争与罢工运动也在继续不断的兴起，兵士群众也在日益革命化。然而这些只能说是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形势，还不能说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革命高潮的主要的标志，一定要注意革命势力中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只有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涌现了工人斗争的高潮，广泛的甚至落后的工人群众都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积极，才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标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根本，才能领导各种革命势力汇合起来，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暴动。现在工人斗争的形势，的确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已经渐次从国民党黄色工会领导之下脱离出来，走向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从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向直接斗争。这样的不同，的确有严重的政治意义，证明工人阶级已经得到很多的政治经验，已经有了更高的政治觉悟，成为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主要征兆。可是另一方面的确表现出还停留在一厂一业的斗争，还没有汇合成为伟大的争斗，还表现出时起时伏的散乱的形势，特别是还留有不少的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幻想的残余，以及最主要的产业工人——铁路，海员，兵工厂，市政工人，还没有普遍的积极起来，这些现象就可说现在还不是广泛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高潮。自然在现在军阀混战

日益扩大，统治阶级统治的力量日益削弱的形势，经济与政治的恐慌更加严重的形势，特别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会是很慢的。而且在这样客观条件日益成熟之中，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这是要我们严重的注意，决不可丝毫忽视的。但是即令明天就爆发革命高潮，今天这样的估量，仍然不免是错误的。

就一般的说决不是每一个工人群众的总罢工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各种必要的条件的配合。在现在的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的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更是我们应当特别严重注意的。因此取消派在估计客观形势的时候，完全把农民暴动的发展除外，现在更进一步的与国民党同声的置红军为土匪，这除掉帮助统治阶级欺骗群众来消灭革命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三) 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 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

我们对于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左倾幼稚的观念固然应当避免；可是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错误。在现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左倾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必然会犯到这样策略上的错误），还不会大有害于群众斗争；可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错误，不要说连到策略问题，就是这种观念本身已足

灰懒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已经是帮助统治阶级松懈革命阵线缓和革命斗争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应当严厉的指斥这种观念的错误！

我不愿意多来批评取消派的“现在丝毫没有革命高潮的象征，只是统治阶级稳定，革命低落时期”的说法，因为这不过是帮统治阶级宣传的无耻的勾当。经济的事实已经回答他：严重的工业恐慌与军阀战争所造出来的饥荒与破产都表示出革命的形势。政治的事实也已经回答了他：反动统治的恐慌，战争的扩大与延长特别是工人斗争的尖锐化，农村暴动的普遍发展，红军的扩大与兵士的革命化。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革命形势的存在与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吗？如果否认这些事实，那么，他若不是瞎子便无疑的是在无耻的替国民党蒋介石作宣传。我要劝动摇于取消派的人们（声明一句决不是劝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梁干慈……等纯粹的取消派，因为他们已经是自觉的阶级叛徒，列宁主义的叛徒），去拿列宁著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资基第七章甚么是国际主义中论到当时欧洲革命形势的一段细读二遍，便了然于这样的真理，便可知道陈独秀彭述之们现在干的甚么勾当！

现在要特别批评的就是党内现存的一种对工人斗争的悲观观念，他并不否认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觉得现在工人斗争没有如农村斗争一样的高涨的形势，也还是对的。可是他因此便怀疑到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他觉得工人斗争很难有很快的高涨，这就是极危险的右倾错误。在他这一分析上，缺乏一点非常重要的认识。他只机械的看到了现在群众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党的组织是更加不够，便结论到革命高潮不会很快的到来。他却不知道在经济政治的恐慌日益

严重，广大群众失业破产饥饿死亡没有出路，这些革命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时候，再加以统治阶级改良欺骗日益破产和群众斗争已在发展的条件，那么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而且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之下，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的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这是在革命的历史上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证。如果在党决定策略的时候不抓住这样的客观形势，无疑的要犯到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无疑的将会成为革命发展的尾巴，甚至阻碍革命，那就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了。

自然这样的认识决不会使我们松懈对于加强城市工作的特别注意。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尤其要特别加强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极力扩大群众的组织与党的组织，加强群众的斗争力量与党的政治影响；然后才能树立强固的基础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领导革命的彻底胜利。否则革命高潮的爆发，将使我们措手不及，而又受到严重的失败（不管这一失败是如何暂时的，都是严重的罪过）。所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的工作，加强赤色工会的组织，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是目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

目前全国范围内还不是革命的高潮，但显然的是逐渐接近于这种革命高潮的形势。因为如此，所以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在目前便应该使广大群众的严重注意，因为他造成了最近斗争的目标，他已经有了实际的策略意义。

就全国范围内看来，命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上

兵，红军，确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的向前发展。在目前这一统治阶级大破裂的客观形势之下，使着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必须显明的认清最近革命发展的前途。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已经无疑义的正在成熟，我们只是不能预料其爆发的时日，只是要尽量准备着这一爆发，只是要用最大的主观的努力，以配合与促进这一客观形势的发展。

在这样形势之下，怎样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我们党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上说：

“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

这个原则在目前接近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之下，他有严重的策略上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当全国范围内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但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集中的组织，还没有垄断全国经济之唯一的中心。上海是长江流域的统治中心，但还不能说是全国的唯一中心。南方的经济中心是香港，北方的经济中心是天津，满洲的中心是大连与哈尔滨，他们固然都受上海的影响，但上海并不能绝对的支配。这种形势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使全国政治上有许多封建军阀的势力，将中国分裂成一种显然割据的局面。这不仅对统治阶级有严重的影响，他同样也影响于革命发展的前途。柏林的暴动，可以——并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

胜利便是在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确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上海是中国第一个产业中心，这里若发生了暴动，自然对全国以至对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并不能马上使全国反动势力都完全死灭，一九二七年的三次暴动便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其他的城市，自然比上海的领导作用还要小。在这一种形势之下，革命势力在某一省或某几省得着胜利之后，反动统治还不免可以在其他省区内保持一个相当时期的最后挣扎。我们的任务是要力争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来完成我们全国革命的胜利。

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还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但他必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这种政权虽然建立于一省和几省，但他的基础一定不只是依靠于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势力，而必然要依靠于全国范围之广大的革命高潮。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省或几省的政权，不但不是一个和平割据的前途，并且比现在各省苏维埃区域还要更激烈的争斗，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经过一省或几省的政权，过渡到全国范围内之苏维埃政权的胜利。

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

六次大会指示我们：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

最近政治事变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显示出全国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可是另一方面虽然全国的统治阶级

无疑的都在日趋于崩溃，然而各省军阀撑持他的统治的力量上已有明显的强弱的不同；因此全国的革命斗争虽是同样的日益尖锐，而发展的速度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也就表现在某几省区更加成熟的形势。这完全证明六次大会指示的正确。因此在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的战略。

第一，首先要了解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因此要取得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首先要注意全国的配合，没有全国的配合，决没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现在军阀混战的扩大与加深，无疑的是更便于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条件；可是只要革命已经或者将要在—省几省胜利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帝国主义，马上要抛弃他们相互的矛盾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以前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来准备自己的力量形势，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是绝对不会有的事，—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以后必然是紧接着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战争。如果不是有全国革命的高潮，如果不能调动全国无数千万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拚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加上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的有力的援助，一致的斗争），决不能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省与几省政权，必须是紧接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决不能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所以在准备夺取—省与几省政权的时候，如果只注意在某几省

区的狭隘的范围而忽视了全国工作同时加紧的配合，便是绝对的错误观念。

第二，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所以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的策略。还要特别认识，在统治阶级日趋崩溃，乡村的统治日益失败的时候，必然要紧抓着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作决死的挣扎，因此城市的争斗必然要比乡村还要残酷十倍。所以在城市尤其重要产业工人中，树立起摧毁不坏的基础，唤起着广大群众拚死斗争的决心，是目前最严重的工作，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在中国客观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的暴动，兵士的哗变，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绝对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这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轻视农民，不要红军的思想，无疑的是企图削除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消灭革命的战斗力的反动思想。同样，认为现在城市的工人的斗争尚未高涨起来，要现在农村中采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红军的发展的等待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伟大，比以前俄国革命的情形，还

要严重的多；在土地革命中产生出伟大的红军力量，更是中国特有的条件，这是托洛斯基主义取消派所绝对不能了解的，所以托洛斯基主义的危害革命，在中国尤为严重。现在的形势，工人斗争固然还没有进到革命的高潮，农民暴动与红军发展也还是表现着不够。我们应严重注意加强工人的斗争力量，决不应过虑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超过城市超过工人。因为即令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超过城市，超过工人，决不会有害于城市工作有害于工人斗争，而且还可以帮助工人斗争更便利发展的条件。所以我们的策略，不是停止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而是要特别着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所以我们对于农民与红军，同样要采取积极发展，扩大与进攻的策略。

四月二日

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

现在革命的发展，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着新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一形势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把广泛的落后的群众——无论在城市与乡村都是一样，都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因此加紧准备武装暴动，准备并促进这一新的高潮的到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成为党的目前的中心任务。

按照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的条件，这一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将要在—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决不能与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分离，尤其是要争取这一胜利，必须是工人，农民，兵士，红军斗争力量的总的汇合，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极广泛的罢工运动，没有中心城市的政治的总罢工，决不能夺取—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

因此无疑的，红军是主要革命力量之一，可是想单凭着红军的力量，来夺取一省与几省的政权，建立全国革命的政权，便是一种异常错误的观念；因为不只是不可能的幻想，尤其是这样的观念，便会在策略上忽视着我们最主要的工作：组织工人的争斗，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一偏向的来源由于不信任现在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斗争的悲观观念。他觉得“现在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乡村的发展，特别是红军的扩大远超城市，远超过工人的斗争。”因此便形成单凭红军的力量可以夺取政权的观念，而在策略的结论上便必然走上忽视应特别注意加强组织工人斗争的偏向。

自然从这样对工人斗争悲观的观念出发，而走到这一策略的偏向，还是比较积极的较好的一方面，更坏的一方面必然会走到取消红军，取消农民暴动，取消革命的取消主义派倾向上去。

就现在的斗争形势看，乡村已有极广泛的农民暴动，苏维埃区域普遍的发展，而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是一厂一业的罢工而没有形成伟大的政治斗争，的确是表现不平衡。不过这仅仅是表面的，今天的形势。至于阶级斗争的实质与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无论城市与乡村的确是同样的异常的尖

锐。无论在南方与北方，在任何一个城市中的工人斗争，每一个很小的经济斗争都很快的转变为严重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转变为残酷的武装斗争；而且激烈的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争斗，已经普遍的在工人中发展，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都爆发了政治罢工与示威运动，这就充分表现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其所以还没有汇合成为伟大的总的政治斗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白色恐怖的镇压，统治阶级镇压革命的力量还超过工人斗争的力量。无疑的现在统治阶级是日趋崩溃的末日，可是正因为他在日益恐慌，特别是在乡村已表现失败的时候，他必然要尽他的力量在城市中作顽强的挣扎。这样就造成城市工人斗争，更残酷更严重的条件，这样就造成今日城市工人斗争还没有总的爆发的形势。如果统治阶级在城市，也如在乡村一样毫无统治的力量了，那么，便已经到了他上断头台的最后的末日。

因此，城市的争斗，既然更加严重，更加残酷，所以更需要伟大的强固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才能冲破白色恐怖的镇压，战胜统治阶级，促进他的死亡，就现在主观力量的估计，的确，无论在党与群众的方面都还是异常不够。因此特别注意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加强党与群众的力量，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以汇合现在还在散乱的斗争形势，成为伟大的革命高潮，这是党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任务的最中心的策略。

可是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认识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无可解决的经济政治危机迅速的加深，无疑的要使到统治阶级统治的力量继续削弱，更促进工人斗争力量的飞速发展，而造成革命高潮的更成熟的条件。这就是说现在统治阶级这样的镇压，仅仅是企图维持自己生命的挣扎，不只是不

能由这一挣扎重复走到“稳定”的途程，而且这一挣扎只是加速他的崩溃。因为统治阶级无办法缓和根本的政治经济的危机，自然最后挣扎的白色恐怖，只是更促进广大群众的愤慨与斗争的决心，使最落后的群众都会渐次认识除掉推翻现在的统治，毫无生路。所以我们目前特别注意加强工人斗争的力量，是有很便利的客观条件。虽然这一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可是，确有很快发展的可能。并且在这样客观条件更加成熟的时候，将会在一瞬间，爆发出伟大的斗争，这就是说从现在到工人革命的高潮，决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如果只看见现在工人的总的斗争尚未形成便主张停止红军的发展以等候工人斗争，是异常错误的观念。

所以特别注意发展工人斗争的力量，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以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力量，这是现在党准备新的革命高潮，首先夺取一省与数省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中心策略。单想凭借红军的力量以夺取政权自然是错误的观念；如果企图停止红军的发展以等候工人斗争的高潮，甚至主张取消红军，那就走到了与取消派的观念毫无根本的区别了。

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转变

现时全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的前面，紧随着这一问题要同时，而且必然同时提出的就是革命转变——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目前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

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所以无疑义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取消派认为现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终了的滥言，只是使我们放松民主革命的任务，放松动员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主思想。可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同时也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

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革命，经济怠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与武装进攻等。这一残酷的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这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一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干到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削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并且为着对付严重的经济封锁必然要实行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同时在政治上，为着对付这样顽强的反革命的进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独裁的政权，这就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和银行，由革命政府来组织生产管理生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了。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

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时革命政府如果不坚决执行

阶级的政策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和银行以削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武器，不只是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会障碍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所以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另一方面如果以为“革命胜利的前夜，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开始胜利后，革命政权一开始建立便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政权”，也是错误的。这就忽视了革命转变的过程（不管这一过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是一必然经过的），忽视了这时反帝国主义反豪绅资产阶级的残酷战争，还需要民主革命的口号和政策以动员千万、万万群众来克服这一反革命的进攻。所以这一错误的观念，也是很危险的。

革命胜利的开始，必然就是更残酷的阶级战争，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除掉极力进行反革命武装的进攻外，必然还要用尽一切方法来引诱尚留在革命战线的小资产阶级（乡村残留的富农与中农，城市中的小商人……等）来反对革命。所以在革命转变的过程中不可免还要发生新的动摇与叛变。所以我们决不应幻想革命的和平转变，而要从现在起运用我们正确的策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雇农的独立组织并巩固与贫农的联合，肃清富农的影响，稳定中农的动摇，以减少将来革命转变的困难。这样正确的坚决的策略，的确有决定将来革命转变，比较顺利的严重意义，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的。

决定这一革命以及革命转变胜利的另一重要的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依据中国半殖民地的条件，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将是不可分离。中

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空前猛烈的争斗，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就目前世界革命浪潮正在高涨的条件来说）同时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所以特别加强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特别是加强斗争的联系，实在是目前严重的任务，是准备革命胜利与革命转变的主要条件之一。

选自《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 的首先胜利

(一〇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一、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一) 最近国际事变的发展：海军会议以后，各国战备的竞争更加急剧，法意冲突的尖锐，英日美极力操纵中国军阀战争，显示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更加迫切。日本极力利用白俄扰乱的阴谋，白里安组织欧洲合众国以一致进攻苏联的企图，美国指使美洲各国对苏联绝交，环绕苏联各小国波兰、立陶宛等在美法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军事的动员等，更表现着帝国主义一致向苏联进攻的紧迫。这是由于全世界资本主义都走到严重的恐慌时期，从它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产生出这样不可解决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各国工人阶级罢工浪潮的汹涌，失业斗争的扩大，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成绩，更增加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社会民主党以及他的左派日益丧失他在群众中的地位。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高起来，尤其使我们严重注意的，普遍全世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高涨，印度革命的高潮，安南的暴动，以及其他各殖民地的扰乱，中国革命急剧的发展，这样一切，都是在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全世界的基础。因此帝国主义更加紧迫的企图首先进攻苏联以挽救自

己的危机。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主要的危险。这样普遍全世界的严重的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便是说明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面前了。这一国际形势，无疑是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是与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时完全不同的优越的条件。

(二) 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看来，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地方；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帝国主义——英日美冲突最激剧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革命最深入的地方，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最易于尖锐化——譬如现在每次工人的经济斗争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样，一切帝国主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国而且最易于尖锐化，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向革命来找寻自己解放的出路。所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三)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地及原料的供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假如帝国主义的统治失掉了中国，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英日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末日到临。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一致的用尽一切的可能极残酷的来镇压中国革命，所以中国革命必然要遇到与

帝国主义的极残酷的战争。可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爆发，可以掀动全世界大革命的客观条件，到了这一残酷战争的临逼，我们不只是可以动员国内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对帝国主义作激烈的斗争，并且可以号召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无疑的，在这一最后决战的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

(四) 对于这一形势认识的错误，成为取消思想与一切右倾思想最主要的根源。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爆发的时候才有可能”，以及一切右倾同志认为“现在革命固然是在发展，可是将来对帝国主义没有办法”和估量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条件，要选择“在帝国主义势力比较薄弱的省区”，都是不了解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而掀起全世界大革命，中国革命便要在这一世界大革命当中取得胜利的可能的客观条件，而勇敢的争取这一前途。我们必须明确的指出这一悲观的右倾观念的错误。

二、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

(五) 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因为帝国主义各种根本危机的影响，特别是两年以来继续不断的国内军阀混战，已进到异常剧烈的恐慌。金融紊乱，产业衰败，失业的危机日益增加。百物昂贵，劳苦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农村经济更是空前的破坏。普遍全国的灾荒兵祸，使千万群众陷于饿冻流离死亡的境地。南方大部分的区域都处在农民与地主的残酷战争当中。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都已经无法挽救这样的危机，无法统一全国，而且都必然要更加瓦解，更加崩溃。另一方面，工农劳苦群众处在无法生存的境地，只有进行坚

决的革命斗争。这就完全说明革命的客观的条件的成熟，回答了取消派“资产阶级统治正在稳定”的谎言。并且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飞速的向前发展，工人罢工浪潮的扩大，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广大工人群众从国民党黄色工会欺骗之下脱离出来，走向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斗争，从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的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到直接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是证明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向着革命的高潮飞速迈进。经过今年红色五月——五一与五卅，普遍各地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一形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农村斗争，无疑的已经进到极广泛的高潮，不只是使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在农村中崩溃起来，而且在许多区域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统治全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对立起来。经过这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必然要有更迅速的扩大。加以红军的猛烈发展，与军阀军队士兵群众的革命化，自觉叛变的增加。这一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

(六) 这样一方面，统治阶级继续削弱崩溃，另一方面，群众斗争日益逼近革命高潮，极明显的指示出这一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并且只有工农群众的革命暴动的胜利，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因此共产党的当前的任务，就是号召广大群众，以革命斗争来反对军阀战争，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

(七) 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是革命的先进阶级，一般的甚至落后的群众对政治斗争的积极，伟大的政治罢工在主

要的城市中爆发起来。可是如果只看到现在城市与乡村发展尚未平衡的表面的形势，而忽视着工人斗争，阶级对抗的异常尖锐化，广大群众革命的决心与勇气正在飞速的增加与统治阶级统治力量的日益削弱与破产，这样形势之下，在每一个事变上都有爆发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可能，那末必然要形成严重的右倾甚至取消思想。工人罢工运动尚未形成革命高潮的主要原因，决不是工人革命觉悟的落后，尤其不是工人不需要革命，而是由于正在崩溃的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白色恐怖与欺骗，极力来镇压工人斗争，所以城市的斗争比乡村要更加严重，更加残酷，这就说明要我们更加倍的努力于城市工作，以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可是现在工作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工人斗争的怀疑悲观的右倾观念，肃清这样的动摇，是推动工人斗争高潮迅速到来的主要条件。

(八) 就一般的说，并不是每一个工人群众的大的斗争，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必要的条件的配合。在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不仅如是，而且在现在的形势，如果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斗争，这就是统治阶级不只是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无力镇压革命斗争，无法统治的时候了，这就有了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所以我们可以指出革命高潮的爆发必然要紧接着武装暴动。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不只是一要注意政治上的准备

——在广大群众中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而且就要加紧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认清这样的客观形势，无疑的会犯到策略上的严重的右倾错误——忽视武装暴动准备的必要，而且无疑的会成为群众的尾巴，甚至阻碍革命。

（九）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在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所以革命高潮，可在这一省或那一省首先爆发，但决不能有离开全国的单独一省或几省的革命高潮。因此，党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的时候，必须严重的注意全国的配合与发动。割据一省或几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无疑又是极端错误的。

三、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 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

（十）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的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的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支配之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十一) 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要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一定要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与加深，无疑的是更便利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积极争取这一胜利的实现，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可是要注意革命已经或者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国帝国主义，要暂时抛弃他们互相的冲突，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以前第一次大革命时，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来准备自己力量的形势，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必然马上遇到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战争。所以必须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来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革命政府才能很迅速的调动全国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拚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援助和一致斗争，以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只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只是全国革命进到更剧烈的斗争，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以与这一总的形势配合。所以在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全国工作，同时加紧，并且要注意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

(十二) 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

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更要注意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这残酷斗争必然比乡村更加厉害，所以要加倍的努力城市工作，在主要城市，尤其是在重要产业工人中，树立坚固的基础，唤起广大群众拚死斗争的决心，是目前最严重的工作，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十三) 在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暴动，兵士暴动，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不能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轻视农民，取消红军，无疑的是企图削弱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消灭革命战斗力的反动思想。农民在革命中伟大的作用，在中国有更严重的意义；在土地革命中产生红军，更是中国特有的条件，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同样认为现在城市的工人斗争，尚未进到高潮，要农村采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红军的发展的等待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工人斗争固然还没有进到革命的高潮，农民暴动，士兵暴动与红军发展也还表现着不够，所以我们是要特别注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同时要抓住农民暴动的发展，士兵暴动的爆发与红军猛烈的扩大。

四、改组派与取消派

(十四) 在革命继续急剧的向前发展当中，改组派更暴

露了他是统治阶级的一派，不只是在此次军阀战争中完全与帝国主义和阎冯军阀相勾结，而且在广西与法帝国主义联合一致，极残酷的摧毁龙州苏维埃，屠杀工农革命群众数千人之多。证明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中间营垒，完全是一种迷惑工农群众的谎言。不过因为他处在半在野的地位，可以喊出一些改良欺骗的口号来愚弄群众，所以他还能打入一部分群众中散布改良的幻想。特别在农村中，富农群众是他最好的基础，更易于扩大他的反革命的作用（最近在湖北苏维埃区域中，已经发现了改组派的有组织的活动，便是明显的例证）。这是要我们严重注意，积极到群众中去揭破他们反革命的面目。这一斗争，不能有丝毫的忽视。

（十五）现在取消派无论在他的政纲上（召集国民会议），行动上（勾结工贼，破坏罢工，在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中实行反革命的阴谋），都与改组派没有丝毫原则上的差别。他的作用完全是欺骗群众和缓革命，成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另一工具。到革命高潮的时候，更无疑的要公开的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变成完全的法西斯蒂。所以对取消派的斗争，不只是党内思想上的斗争，而且要特别注意到群众中揭破他们反革命的作用，消灭他们的影响。

（十六）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当中，特别是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这一工具完全破产，改组派汪精卫必然成为帝国主义最宠信的工具。取消派陈独秀各派，同样要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更积极的反革命，这是极明显的前途。只有我们从现在起，坚决的到群众中去肃清他们的影响，才能扫除他们反革命的危险。这是准备革命高潮准备革命胜利的主要任务之一。

五、准备革命的转变

(十七) 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无疑义的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取消派认为现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终了的滥言，只是使我们放松民主革命的任务，放松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反动思想。可是现时无产阶级已是唯一的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并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

(十八) 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革命，武装进攻，经济怠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等。这一残酷的战争，是对帝国主义地主买办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这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一定要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并且为着对付严重的经济封锁必然要实行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同时在政治上为着对付顽强的反革命的进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独裁的政权。这就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转变主要是阶级关系的转变，无产阶级专政，便已经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

(十九) 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

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时革命政府，如果不坚决执行阶级的策略，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铲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便会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会障碍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所以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另一方面，如果以为“革命胜利的前夜，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开始胜利以后，革命政权一开始建立，便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政权”，也是错误的，这就忽视了革命转变的过程（不论这一过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必然是必然经过的），忽视了这时反帝国主义反豪绅资产阶级的残酷的进攻，还需要在民主革命的口号和政策下来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来克服这一反革命的进攻。

（二十）革命胜利的开始必然就是更残酷的阶级战争，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除掉极力进行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必然还要用尽一切方法来引诱尚留在革命战线内的小资产阶级来反对革命。所以革命的转变的过程中不可免的要发生新的动摇与叛变。所以我们决不应幻想革命的和平转变，而要从现在起，运用我们的正确策略，加紧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雇农的独立组织，并巩固与贫农的联合，肃清富农的影响，争取中农，以减少将来革命转变的困难。这样正确的坚决的策略，的确有决定将来革命转变更加顺利的严重意义，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的。

（二十一）决定革命胜利以及革命转变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依据中国半殖民地的条件，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将是不可分

离，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空前猛烈的争斗，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同时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也很难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所以特别加强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特别是加强斗争的联系，是目前严重的任务，是准备革命胜利与革命转变主要条件之一。

六、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

（二十二）在革命急剧的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二十三）军阀战争这样继续扩大，使广大群众陷于流离、破产、死亡无可挽救的地位。整个国民党的统治，不只是表现到他自己已经走到最大的恐慌，特别是广大群众已经对他绝望。因此只有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在反军阀战争的中心口号之下，才更能动员广大群众。如果党不积极的提出这样的口号，而单只提出一些部分的经济的要求，反使群众感觉无出路而不积极的起来斗争。群众好久以前就在说：“是暴动的时候通知我，我一定到来”。现在党应当勇敢的号召群众，“暴动的时候快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过去党对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注意得异常不充分，是严重的缺点。现在党必须坚决提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特

别是反军阀战争的口号，组织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士暴动，号召红军积极进攻，以实现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的总路线。

执行这一路线，首先要注意到中国革命的国际的任务。中国革命的爆发，不只是一要促起帝国主义一致的压迫中国革命，而且要促起帝国主义更积极的进攻苏联。因此武装保护苏联，要成为革命的中心口号之一。并且要同时注意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革命斗争的联系，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革命群众中的宣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也在日益紧张起来，因此作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和鼓动，加紧发动极广泛的反帝运动与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也同样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在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加紧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决议，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运动。必须告诉广大群众，只有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一运动，必须深入到每个工厂、学校、农村中去，以鼓动广大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决心。

(二十四) 这一路线的最中心的问题，是组织政治罢工。不只是一要注意在经济罢工中加紧政治的宣传，不只是一要领导每个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而且是要坚决的提出政治的口号（如反对军队驻厂，反对白俄，反对拘捕工人，反对黄色工会，要求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最中心的是反对军阀战争），来组织广泛群众的政治罢工。没有坚决的政治斗争，决难取得经济的胜利，只有坚决的政治口号，才能更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在战术上每个政治口号的鼓动，每个政治斗争与经济要求的联系，自然是要严重注意的）。组织

五一，五卅运动的教训，一般的都是政治的宣传鼓动不够，不能勇敢的提出政治的口号来组织五一，五卅的罢工，大家只注意到以经济的口号去发动群众，这是在各地未能组织广泛的罢工的主要原因。这是极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不只是群众的尾巴倾向，而且是障碍群众斗争的严重的错误。

(二十五) 现在工人运动中一般组织的薄弱，成为最严重的弱点，我们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用最大的努力来扩大赤色工会，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可是一定要注意到只有在坚决的政治斗争的口号之下，这一努力才能收到更大的成功。必须坚决的发动争取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的斗争，发动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斗争，才能团结更广泛的群众。如果只束缚在狭隘的秘密的范围之内，群众组织很难有广泛的发展，很难巩固起来。

(二十六) 建立并扩大工人群众的武装组织（赤色先锋队与纠察队），加紧军事训练，成为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只要是在斗争中宣传组织纠察队的必要，而且要以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来鼓动广大群众加入纠察队与赤色先锋队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迅速的扩大群众武装组织，才能使纠察队和赤色先锋队成为暴动的中心队伍。

(二十七) 坚决的组织地方暴动，是实现目前总路线的主要任务之一。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是农民暴动的最高形式，他的前途必然要与中心城市汇合起来，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现在农村斗争，已经进到高潮，无疑的地方暴动的条件，已经是一般的成熟。党应毫不迟疑的，在号召地方暴动的口号之下，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实现这一任务。现在实现这一任务的障碍，是

过去“游击”的观念，只是攻打城市，而不是夺取城市，没有决心将地方苏维埃政权在城市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反映，与目前的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地方暴动胜利以后，应当马上建立起地方苏维埃政权，并且应当马上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坚决的进攻，积极的向外发展。

(二十八) 猛烈扩大红军，更是目前严重的任务，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在军阀制度统治的中国，没有强大的红军力量的配合，决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党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党，应当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加入红军，拥护红军，集中武装到红军中去。必须告诉广大群众，只有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完全推翻，只有全国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以冲破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这一观念，是目前猛烈扩大红军的最大的障碍。第二个严重的障碍，就是没有认识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仍然株守着游击战术的军事观点，来反对红军的扩大以及扩大（进攻）的策略，这是完全不了解军事的战术，配备，编制，组织都应随着整个政治路线而改变，如果用旧的军事观念来束缚党的策略的转变，便是严重的右倾错误。

(二十九) 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一定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的计划之下，有配合的有组织的实现他的军事作战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现在红军另一严重的任务，就是特别加强阶

级的政治教育，目前红军的成分农民群众占了最大数量，这必须严重注意阶级的政治教育，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肃清一切农民意识的错误倾向。

(三十) 在目前总路线之下，兵士运动的任务，不只要发动军阀军队的兵变，投到红军中来，而且要以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兵士暴动为中心战略。这就是说，不只要鼓动简单的零碎的哗变，而且要有组织，有计划，并且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的举起反军阀战争的旗帜，实行消灭军阀的暴动。这样在暴动以后，便应坚决采取进攻的战略，以瓦解军阀的军队，切实纠正过去哗变以后即行逃跑的办法。

(三十一) 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系统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已经在事实上，从党内的反对派发展成为阶级的敌人，需要党在党内特别在群众中更坚决的斗争。可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思想，因为他表面赞成党的路线，而在每个实际的策略上都发生怀疑，动摇，怠工，不积极的执行，的确是同样的成为目前的莫大的危害。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有充分的执行。

(三十二) 青年与妇女是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力量，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忽视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倾向。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现在任何一个斗争上，都看到青年与妇女的积极作用，党应当积极的把他们吸引到革命的战线上。党更要多方面帮助青年团工作的转变，反对团内的清谈倾向。

七、党的组织问题

(三十三)目前党的组织力量的不够(特别在城市中)，是革命的主要的弱点，在任何一次斗争中都极明显的表露出来。如果因组织上的弱点而怀疑现在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可是忽视党的组织的弱点，不积极的为强固党的组织而斗争，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因此特别注意强固党的组织，是执行目前总路线的总任务。

(三十四)在目前党的组织上，的确暴露出许多异常严重的弱点，首先是在工人中发展的缓慢，无产阶级基础未能迅速的扩大起来，新的工人化的干部引进得非常之少，支部生活不健全，不能在群众中实现核心的领导作用。这样党的正确的策略不能完全传达到群众中去，而群众的落后意识，却时常反映过来发生对于党的策略的动摇。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支部执行反右倾的斗争异常不够，许多地方反右倾简直还没有传达到支部中去，以至许多动摇的右倾分子尚占据着支部的领导地位，妨碍着一切策略的执行，首先就妨害着支部生活的健全。因此在支部中坚决执行反右倾的斗争，加紧支部的教育，培养支部中的干部分子，是健全支部生活、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的路线与策略能够实际的正确的执行的先决条件。这是要特别唤起各级党部严重注意的问题。

(三十五)现在党的组织上，还表现着一种小资产阶级浪漫性的危险：不能有组织的、有规律的去进行工作，督促工作，常常表现着寒热症的状态，这是大有害于工作的紧张，特别是对秘密工作的忽视，简直直接影响党的存在。最近几个省区的严重破获，主要原因都是由于不注意秘密工

作。这样严重的血的教训，应该唤起全党的莫大的注意，坚决与小资产阶级浪漫倾向斗争，成为巩固党的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五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罗章龙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参考文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 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总党团及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案发表之后，右派小组织以罗章龙为领袖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并且公开的发表反党的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个问题更加严重，特成立下列决定：

一、这一反党的小册子，是右派小组织反国际的整个纲领之最具体的表现，而为章龙所主持的（便是与他同道者西更同志*也不能否认这是章龙编印的）。罗章龙在这小册子上，

*此处所写的西更即已经反革命的徐锡根——编者

学尽取消派反党反国际的口吻：第一，他是公开地“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所以他说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而继续“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成立临时中央，主持紧急会议”。但是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领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并且罗章龙所继续号召的紧急会议与主张成立临时中央，更是露骨的分裂党的第二党的主张。这样，他便更进一步的反对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国际代表，但是，国际代表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来指导中国党的，所以反国际代表实际上即是反国际——这是陈独秀以及一切反共产主义“左”右叛徒所用惯的把戏。第二，他更等于向敌人公开告密，说四中全会是国际代表某某领导；这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因为这种宣传，除掉便利于敌人的巡捕房、警察局外，再没有其他意义。第三，他说“立三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这一估量的根本思想是在本年一月一日他所起草的全党团决议案上。这一决议上说：“立三主义是破坏了党与团的组织，是破坏了工会与其他群众的组织，是破坏了红军，是破坏了中国的革命。”这种不正确的估量，正是暴露他自己对于革命的失望，其目的是要得出取消派的结论。根据这种估量来借口反对整个领导，用意是在破坏我们的党。因此，他说“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恶骂中央“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证明

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贼同其性质”，所以他主张“立即停止中央行使职权”，“根本改造政治局”（即是全部撤换）。这与取消派的估量和要求完全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党从革命斗争紧张战线上拉到右派的退却路线上来。最后，他自然就暴露了他一贯的反六次大会的立场，他认为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右派布哈林领导之下采取了调和立场的；其实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绝对正确的，不仅布哈林的右倾路线没有在那时暴露，便是布哈林演说中的个别错误，也没有为大会所接受，怎能说到了是调和立场？这样，就更加证明他的右派纲领与取消派一般无二。根据这四点，已足证明罗章龙思想和行动，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人了。

二、这一反革命小册子的印行，完全是罗章龙把持全总党团机关用以进行其反党的右派的小组织之最具体的产物。同样，在一月以后，罗章龙主持的全总党团，除掉成立一月一日的右倾决议案外，并在一月十七日公开号召与领导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对国际；在组织上派遣被他煽动的同志到各省（如满洲、河北、山东、广东等省）去进行反党的右派小组织活动，最后他还抵抗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日决议的执行，丝毫不改变他的反党行动，而且还鼓动全总党团同志拒绝移交全总党团的工作。这一切都表示他没有丝毫诚意来在全总党团执行国际路线，而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的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

三、罗章龙这种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他远在六次大会前陈独秀时代和两湖秋收暴动时

候，就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六次大会上，他并没有承认任何他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提出了不要任何旧的中央委员当选新中央委员的主张，当时是遭了国际代表与大多数到会代表反对的。六次代表大会后，他对于六次大会路线的执行是机会主义的消极，在全总的工作可以做为证明。并且有些政治问题，是常常暴露他的右倾观点的，如对六次大会后至去年六月以前的中央路线是否正确不回答，对那时期党的进步不回答，认目前中国革命运动还不是高涨时期，他一直在四中全会后还是如此坚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他领导了少数同志，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国际路线，并声明退席。会后，他又在四中全会决议案修改委员会上举手反对四中全会决议案，所以他结果便拥护与取消派一类而已被开除的王仲一（他公开说他自六次大会以来反对中央一贯的路线）来参加紧急会议。在国际来信前，党内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罗章龙是一贯的采取消极态度。国际来信后，他便由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而站在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党反对国际了。尤其是他所进行的右派小组织，欺骗一些同志到环境不允许而对党秘密的地方去开会，便利敌人以破坏我们的机关，这是要罗章龙负主要责任的。

四、根据以上这一切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之反革命的行动，罗章龙是一刻不能停在党内与无产阶级队伍中了。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

五、中央政治局特要求全党同志在深刻的认识罗章龙这一类反党的行动中，必须坚决的与罗章龙右派小组织作无情

的斗争。要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完全与他分开，并且与他完全隔离起来。中央政治局更号召被罗章龙右派小组织所欺骗所蒙蔽的同志，应立即醒悟与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并且要向全党公开声明这一右派小组织的一切活动的经过与罪恶。

六、这一决议一直发到支部去，使全党了解开除罗章龙，将是全党在反立三主义反调和主义的热烈斗争中解除右派武装的开始，将领导全党拥护四中全会执行国际路线更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执行坚决的转变，而加速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

一九三一、一、二七，中央政治局通过

附录：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一九三一年一月)

(罗章龙右派纲领)

为彻底肃清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

正当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时期中，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进程是愈加重了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幸，在这个时候党的中央立三路线发生了根本原则上的完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

全党同志为端正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上坚决与非无产阶级的立三路线及其拥护者作无情的斗争，在这个长时期斗争的经过中，是已遭受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顽强的抵抗，并遭受了他们的种种无耻的欺骗和诬蔑，在紧急会议被破坏四中全会举行之后，立三路线中央的背叛阶级利益的罪恶是愈加显著了，全党同志为国际正确路线而斗争，也就是为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责任是更加严重！

因此，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在今天应该有一种严重的责任，为肃清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团结得象一个人一

样，勇敢坚决为着国际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一）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

中央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立三路线统治着全党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结果，使党与革命受到不可计算的损失，这证明中央的立三路线的领导现在是完全破产了（至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历史根源及其对于党与中国革命的恶果，参看另发之材料，此处不重述）。

（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加危险。

中央立三错误路线曾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斥和党内同志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央始则用顽强的态度敌视共产国际的意见，用家长制度惩办手段压迫党内同志的自我批评，后来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间中国问题决议案等来到中国之后，中央召集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上中央更狡猾地模糊混淆着两条原则上不同的路线（国际正确路线与中央立三错误路线），硬说过去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同时否认立三路线的存在，对于全盘皆错的六月十一日中央决议还认为是正确的，又在三中全会根据立三路线补选新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因此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六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过去立三路线还更危险的东西。

（三）三中全会后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继续执行立三路线反对国际路线。

三中全会闭幕后，共产国际最后寄来一封长信，当时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斗争在全党已经到处普遍起来，中央一方面是用压迫手段阻挠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另一方面是用挑拨离间的造谣诬蔑对付一般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分子，但是结果都归无效，中央受着党员群众的威迫不得不从事修正三中全会决议，做出更无耻的几次补充决议。中央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说“三中全会路线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禁止讨论立三路线并限制国际来信及二十五日决议只可达到地方党部，在九号补充决议仍然掩饰调和主义的更大危险性，在九十六号通告仍然是一贯的调和主义，只是表面上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纸上接受国际正确路线，在消极的承认中央政治局的错误的时候，根本抹杀了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实际任务，取消了国际来信所指示的各项迫切任务的主要内容（如苏维埃任务、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同时对于立三路线来源只是片面的认识（认为是盲动主义的残余），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对于党与革命的损害估量得非常不够与模糊，尤其错误的是认为反立三路线便包含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右倾观念，松懈了对于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的攻击，至于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央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的统治，中央在这期间是自觉的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没有丝毫诚意的接受国际路线。

（四）紧急会议是执行国际路线建立党的正确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步骤。

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调和路线更使党的危机加深，革命受着更大的损害，这证明中央已无领导革命的能力并缺乏对于阶级的忠诚（四中全会政治局报告公开承认中央自觉

的反抗国际），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一般党员群众的呼声不是要修改三中全会决议，而是要根本废除他，废除历次补充决议，一致向国际代表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行使职权，由国际领导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组织临时中央机关，召集党的紧急会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紧急会议的要求是围绕着广大的党员群众，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是要求改变党的错误的领导使回复到正确的路线，对于紧急会议的建议如下：

（1）紧急会议列席成分必须以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党的干部与群众组织中的干部同志为主要成分。

（2）彻底接受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

（3）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

（4）正确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彻底予以肃清。

（5）根据国际七月决议及最近来信，汇合全党各方面工作经验，郑重规定党的总任务，党的组织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等决议案（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意见，散见反立三路线各文件中，不久将另整理整个意见提出）。

（6）根本改造政治局。

（7）确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日期（与七次大会密切有关的即目前急须恢复党内民主，进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发表反立三路线的决议与文件等）。

（8）执行铁的纪律，处罚有系统的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中央主要负责分子。

（五）为紧急会议而斗争。

围绕在紧急会议周围的是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最坚决的广大党员群众，尤其是党的下层组织与在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工作同志，他们是不约而同的起来作无情的斗争，就现在所知道的一部分说，已经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苏准会工作全体同志、江南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全体同志、北方天津党部、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上海各区委（闸北沪东沪西沪南沪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属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以及全国积极的工会干部同志等（青岛上海天津武汉海员铁路苏区厦门等地）。中央在党员群众威迫之下，知道简单的高压政策决不足以继续维持其错误的领导，这样便采取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手段，用欺骗的方式向党员群众假装着接受紧急会议的要求，以和缓同志们的反抗，例如中央向全总表示决定召集紧急会议并书面通知全总党团负责人起草紧急会议职工运动决议案，忠发在中央工作会议全国济总党团及苏准会工作同志报告中央已正式决定召集紧急会议（会议的成分规定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参加者不超过四分之一等等），秋白恩来到闸北区到沪中区做报告时均详示服从区委同志决议，赞成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屡次向全总负责人员表示均言全总党团决议的正确并声明政治上组织上保障其胜利，同时却在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这一切都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工贼同其性质，另一方面证明紧急会议的召集是急不容缓之举了。

（六）立三路线派及投降分子破坏紧急会议。

立三路线派是极端仇视紧急会议的，因为他们知道紧急

会议必然是要葬埋立三主义及其统治的，同时还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样犯有立三主义错误的陈绍虞等自然是怀着同样的恐慌，因为陈绍虞等过去是站在左倾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时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线的总策略的（即布置全国暴动总同盟罢工等），他们是用左倾的口头禅认为全国已有直接革命形势，而说六月十一日的估量为过低的，他们在三中全会后是承认“三中全会会有重大的意义”，认为立三主义只剩有“残余”只要中央承认错误“可以避免争论”（引文见陈绍虞十一月十三日意见书），因此在紧急会议运动迅速发展之中他们是用种种不正确的宣传破坏紧急会议的工作，他们说：“立三主义已不存在”，“反立三主义的理论争斗应该停止”，“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实现”，“中央省委已承认错误同志便不应该再谈改造党的组织”，“紧急会议是左倾分子的活动”。这些便是证明立三派及投降分子等是时时在企图破坏反立三路线的运动继续维持立三路线的领导，并且他们这种企图是受着国际代表米夫不正确的指使，米夫是公开地向着全总党团、工联党团、海总党团负责人用左派别的观点估量反立三路线的整个运动，命令他们离开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服从陈绍虞等领导（自然上述各党团负责人是当面拒绝并指斥了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便暗中布置合于旧中央及陈绍虞小组组织派别的目的的四中全会以代替党员群众需要的紧急会议。

（七）四中全会的经过。

四中全会的召集，原则上与党员群众们所提议的紧急会议完全两样。第一，参加会议的成分是由中央政治局自由指

定的，主要的分子是中央政治局本身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罗迈贺昌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长江北方南方各局的书记，这些都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占列席总人数的多数。第二，四中会议的举行，除上述诸分子之外，中央对其他被召列席的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及群众的干部同志是全守秘密的，他们在赴会之前是完全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及会议内容的，因此引起各列会的群众中干部同志的愤怒与严重质问，并一致声明保留其对于紧急会议的意见。第三，会议与讨论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全部会议以时间规定仅仅十五小时，每人发言不得十五分钟，因此有些同志因时间限制连第一次发言都没有允许，这完全表现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

（八）四中全会是没有解决党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并且保证立三派的继续领导。

四中全会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中拒绝同志们提议在肃清立三路线实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讨论党的总任务及诸项重要工作问题，这些不可再迟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被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始终忽略认为不足轻重的和不需要的。第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明明是用调和主义的观点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但是四中全会不敢明白指出，反说“二十五日决议又向国际路线走了一步”（紧急通告已宣布废除三中全会及二十五日决议，四中全会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第三，及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站在离开领导的立场，只是消极的承认错误，忘却了目前党的迫切的紧急实际任务，同时在分析立三主义来源上，在指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在估量立三路

线与调和主义等等地方，都犯着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理由可参阅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对紧急通告的决议）。这些错误都是从调和主义来的，但是四中全会对于九十六号通告却认为完全站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是正确的。第四，正因为上述这些原故，所以四中全会对于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及组织路线实际上是赞助的，在决议案中虽然表示过要取消三中全会的补选，但结果三中全会的补选除贺昌罗迈之外其余多数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分子更加了一重保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公开拥护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把最高指导机关的中央解释成为教育错误同志，试验那些几年以来从陈独秀到现在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地方，因此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陈绍虞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第五，在会场上很明显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从属的上层机关调和主义分子的主张是一方面，坚决反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及下层群众干部尤其工人干部的意见是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中央是有计划的指定列席成分造成自己的多数，实际取消会场的民主，垄断选举并加反对者以种种罪名（如“反国际”“右倾”“取消派”“暗探”“小组织倾向”“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等等）。

（九）反对四中全会要求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召集紧急会议。

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这里更明显的是组织

上的立三主义一贯组织路线（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变本加厉的继续发展，虽然表面上引进了一部分工人同志，但实质上仍继续着小资产阶级书生的领导（如周恩来陈绍虞等），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如九十七号通告充满了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精神），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立即推翻他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国际重派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他召集和主持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产出的调和主义的中央的领导，反对他们召集和包办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十）拥护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

现在立三派及投降分子陈绍虞等小组织是到处继续造谣诬蔑威胁欺骗那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最主要的借口便是说“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这种说法正如李立三及其党徒在三中全会时对于当时反对三中全会同志的诬蔑同一口吻。我们知道当时国际代表领导三中全会犯有错误，他曾经反对“把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对立”又说“党的路线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引语见远东局代表致三中全会的信），我们是曾经反抗过这种错误的，并且现在已经证明我们这种反抗

正是为忠实国际路线而斗争。这次米夫领导的四中全会是本其在六次大会时附和右派布哈林调和主义的立场及其私人派别的成见，完全抹杀党员群众的意见，重复着做出严重错误，显然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原则，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只有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才能使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障碍彻底铲除。

(十一) 号召全国团的同志为反四中全会召集紧急会议而斗争。

立三主义取消了团的组织，是青年运动的极大障碍，立三主义在团里面还有很深厚的基础，团的中央是顺着党的中央系统地做着错误，因此在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运动中，党的同志必须领导团的同志，赞助团的同志在少共国际正确指导之下，从下而上的召集紧急会议，实行向团中央的立三主义调和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解决团的路线问题与组织问题。

(十二) 反对斗争中的不正确倾向。

我们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实际工作上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到底，并且要时时注意站稳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坚决的正确的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奋斗，尤其是反对党内最主要的右倾危险，反对托陈取消派分子乘机混进党内活动的阴谋，反对李立三及陈绍虞等小组织的活动，并且要在不断的以正确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来检查立三路线长期统治之下全党在各方面工作中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所犯的一切错误，同时要在加紧实际工作中去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以完成国际路线所指示给我们的迫切任务。

(编者按：原件无标点)

第 六 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反对王明“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

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六页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八页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

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八九页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九页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

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

“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八九——一九〇页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一页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三页

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一页

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份采取过左的错误政策，如象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五一页

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

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论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二〇——七二一页

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

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五页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九页

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

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生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份，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五〇页

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九二——八九三页

参考文件：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
会议通过)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 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 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

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

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敌人，保卫苏区，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它，应该待它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

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极积的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是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运用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数十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

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人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洵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战役，温坊战役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给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显明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们虽没有象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采取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洵口、团村、

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军事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下，才容许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的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能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了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克服堡垒主义的顺利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而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役，并正确的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

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的人力物力及军火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拚消耗，见××同志红星报的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个“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许多拚命主义的战斗（如毛丁山、三溪坊、平疗、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立即应拒绝这种战斗。要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

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必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和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拼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于疲劳情绪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

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于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于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消灭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个“围剿”之间的严重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的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

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没有的。然而在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 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

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个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的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补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部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

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密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经常说“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物，而不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

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针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惫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的轻巧的与径直的干法，在短短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足表现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

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

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十四) 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的比较好的地方，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的群众拥护，与红

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军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的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南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斗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

中休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证。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中央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

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号召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附录：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一) 共产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中国问题决议案，以及以前的决议，明显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以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和动员革命势力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国民党反革命作开展进攻的任务。然而正在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而走到冒险盲动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人人都明白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给了党极大的损害。要把立三同志反列宁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路线实际施行所产生的一切严重恶果，数个清楚，是不可能的，四中全会现在指出最主要的实际恶果是：党对于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党动员群众的能力是大大的缩小了，一切群众团体的行动是削弱了，我们的职工运动是向后倒退了，对于罢工运动的领导和组织，我们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远远的后退了。党由于立三路线的领导，不但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之下用尽一切方法去巩固党、青年团和群众团体，反而实行在事实上取消群众团体取消青年团和涣散党。别方面，立三同志对于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的制度，引导了党内生活到完全非常状态的地步。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使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行

动，别方面使党内右倾分子的行动，都得以乘机活跃起来。同时好些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举行了暴动——不估计环境，没有必须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威信，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使我们的组织在国内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任务，却完全被忘记了。党内的领导对于开展非苏区农民运动的日常斗争几乎丝毫都不加以注意，因此对于在非苏区农村中领导，发展和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斗争，使之能进到直接帮助和参加苏维埃运动的程度的任务，也完全被放弃了。最后，从立三同志立场所发生的极蠢的错误，在苏维埃区域也发生了，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当我们多少巩固的后防都不曾有，任何必须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都还没有进行，当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群众的帮助的时候，便发出了过早的冒险的固执的指示，去夺取大城市，长沙的失败也是由于这错误的缘故。另一方面，在苏区内，对于立三同志过去的联合富农的理论，没有充分坚决的斗争。对于组织贫农团和雇农工会苦力工会，也没有做任何工作。因为地方党部的完全疏忽与由于立三政策的结果，使富农分子得以侵入指导机关，为他自己利益而获取土地革命的结果。李立三所提议的集体农庄及一切过早的社会主义办法，事实上不能不使富农地位反而更加巩固。禁止贸易自由与土地买卖的指令，使苏维埃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这些错误，使我们和中农的联盟受到危害。使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受到危害。李立三的领导，完全忽视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完全忽视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并且发出取消游击战争的指令，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阶段——

这样就使现在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已经大大削弱的状态。所有这些，亦就是红军现在受着严重失败的大部分的原因。同时，没有进行广大的帮助苏维埃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对于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扩大的四中全会在计算立三路线产生结果总结的时候，特别要指出六次大会以来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为止，中央虽然在富农问题黄色工会问题改组派问题等上面，做了许多个别错误，但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党是有很大成绩。由于立三路线执行的结果。这种成绩中的一大部分已经消灭了。

(二) 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偶然的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一贯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质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立三路线否认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否认中国革命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正确了解，处于完全矛盾的地位，他用托洛茨基否认革命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这就表现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任务，完全的不了解。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理睬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线就取消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当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曲解而且实际上拒绝了马克思列宁的武装暴动的理论，就在理论上来替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建立基础，并且实际上推动党走上这条道路。在这里有关系的，就是立三说：“工人只愿暴动不愿做罢工斗争”。总合起来，

立三路线完全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互相矛盾，不过是“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和对于实际上真正革命的去组织群众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形成而到现在党还没有肃清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立三同志依仗了这样绝对错误的路线，实行了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而用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的理由来说共产国际不知道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

四中全会坚决斥责一九三〇年六月到八月期间中央政治局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以及他对于共产国际敌视的绝对不能容许的态度。并且特别指出：现在党所遭受的一切严重影响，都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们忽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同时，四中全会指出中央委员会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

（三）共产国际要求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理论”，在实行中去完全消灭他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中国现在的形势，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区域，更加使党必须从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坚决的转变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路线上去。从这个观点来估量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现在扩大的四中全会指出：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的好些文件都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只指出了立三同志的个别错误，并且在指出这些错误的时候，也是异常温和的。在决议案中间，甚至连影子都看不出。这里问题是关系到一条绝对错误的路线，原则上和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对于有名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还给他肯定的估量，而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正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

的作用。（三）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也给了肯定的估计，而这中间政治局的工作里正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占着统治地位。

（四）明显的从这种错误的对于立三路线调和的立场里面，就发生好些具体的错误——包含在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及其他决议案的个别条文里面。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证明当时党的领导还是没有认识立三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唯一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自然，这决议案没有造成必要的前提，使党的整个方针有坚决的转变，这些决议案不能够成为揭发立三同志的“理论”和实行上完全克服这些错误的理论基础。

其余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错误的程度更大，更加混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所要求的党的路线上的纠正。例如

（一）三中全会的告同志书，把政治决议案的措辞更加减轻了，于是使党员们完全不能知道共产国际路线和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区别。（二）××同志“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在“实话”第一期上和三中全会决议共同发表了，竟一个字也没有提起错误，更谈不到提起立三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了。（三）中央在三中全会之后的通告里，不但没有去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反而给以根据去解释立三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和国际决议一致的路线了。三中全会总的调和路线，引导到三中全会之后各地党部的工作里，毫没有党的政策真正转变的痕迹。在这个时期里边，北方局、南方局、江南省委和其他党的组织，都通过了不正确的决议。

此外扩大的四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

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态度。这种不尊重表现在：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和共产国际代表互相预先同意了对于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修改和词句（其中有关于立三路线和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的工作的估量），可是，虽然讲好了，却没有加进政治决议案里去，而且这又没有预先通知共产国际代表，以至于共产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对于政治局里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倾向加以纠正。四中全会承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造成纯粹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可能，以及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这里最主要的责任，都应该是××同志负的。

（四）虽然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十二月九日也是同样）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最近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的政治局工作给了正确的估量，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共产国际方面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一决议的第二条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埋没了，它的政治意义大大的损失了。

九月十六号的通告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好些错误，这个通告没有宣告立三主义的破产，而说党的危机——党其实正在现在进了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再则这一通告指出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证明对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了解是不正确的。不错，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然而反立三路线决没有包括两条战线斗争的全部，右倾机会主义可以找到并且已经找到（如郭妙根等）其他的方式去表现他自己。不

可忘记对于立三路线之盲动主义作斗争虽是异常重要，但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且必须牢牢记得党只有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对于他们的调和主义作斗争，并且克服他们，才能站在国际路线基础上，来实行发展革命的进攻。这些在九十六号通告的措辞中都没有提到，这样部分的也就是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之中解除党的武装——这些右倾分子正在假的反对立三主义斗争的旗帜之下积极活动，来曲解国际路线，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来进行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否认右倾危险的存在，和模糊右倾斗争的必要，企图使有些下级组织用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来反对立三主义，例如：否认党内有转变到实际工作上去的必要，要求极端民主化，无条件的撤换整个中央与一切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的武断口号，企图把原则斗争变成派别的和个人的斗争，拒绝自我批评等等；或原这个通告说政治局一直到最近只是在继续和加强立三路线，不错，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立场的动摇，使他不能够领导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可是九十六号通告这样去解释中央转变到共产国际路线的过程却是不正确的，要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实行反对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

(五) 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最近来信，为着实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起见，对于全党提出下列的最不可延迟的任务：

(1) 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去克服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四中全会着重的指出：要执行这个任务，必须实际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必须党的全部工作有坚决的转变，不能够仅仅限于纯粹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

争。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坚决执行党当前最重要紧迫的许多任务。

为着执行这个任务起见，扩大的四中全会认为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

(2) 党的全部工作里面实行坚决的转变，这个转变之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实行斗争去反对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反对消极，反对失望的分子，他们造成各种反党的倾向和偏向的基础，并且也是这些倾向的表现。

(3) 恢复已经损坏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改善群众团体的工作，首先是工会，特别应该注意工厂中的工作，巩固和加强支部的活动，党必须认真利用公开的可能，同时必须用尽方法去发展和巩固自己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

(4) 引进新的干部，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来做领导工作。

(5) 党的全部的各方面的动员，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进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组织工人阶级、农民，反对正在准备的对于苏联进攻——这是最主要的任务。

(6) 扩大的四中全会委托新的政治局根据这个决议案，去规定指令和实际任务给各地党部，以代替三中全会的那些决议。

(7) 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

(8) 四中全会指出：青年团的三中全会接受了党的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路线，并且反映到它自己的决议案里去，而青年团的中央直到最近期间还未表现过纠正自己以前的立三路线的不坚决，实际上没有执行少年共产国际的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四中全会认为政治局已经执行的改变青年团中央的成份是完全对的，青年团中央在改组以后确实已完全站到国际路线上去工作。四中全会同时批准在最近期间召集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

(9) 扩大的四中全会依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党内问题和革新了党的领导，去保障这一路线的执行，四中全会深信，全党将像一个人一样的团结起自己的队伍来，和睦的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担负执行它当前的重要历史中心任务。这就是党的新的成功，这就是中国革命高涨的继续和必然的向上发展中工人群众的新胜利的担保。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摘录）

（一九三一年二月）

陈绍禹

（上略）

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要想正确地懂得和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政权、领导权及前途问题，首先便须正确了解和认清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充分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原料榨取、资本输出及廉价劳动利用的市场，国家一切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铁路、矿山、银行、航业、重要工业等）都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端痛苦、迂回、畸形的形态之下发展着，而且主要地只限于一部份轻工业（纱厂、丝厂、面粉等）并对于帝国主义有极大的依赖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激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经济生活，另一方面还保有封建剥削关系的优势。经济系统是非常复杂，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经济，有“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有简单商业经济以至自然经济。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着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在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首先表现在地主对农民剥削关系上：百分之五十到

七十的农民收获品付给地主作地租、非经济剥削等等) 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 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都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着。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 对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 完全是叛徒罗易之流的“非殖民地化”的理论, 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 使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见反对派刊物《动力》第一期)

“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 封建残余已经没有, 或只是残余的残余。”这不过是歌颂“帝国主义送给落后民族以兴盛、进步和文明”的社会民主党的应声虫! 他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 躲藏在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左的”假面具之下, 实行取消了以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现在阶段的革命, 同时, 即是取消了一切革命。立三同志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 完全代表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认识的另一种有害而且危险的观点, 即是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他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 公开地拥护“中国经济主要的只是封建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的理论, 他不了解他这一经济分析的危险是否否认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事实, 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存在, 否认了乡村中阶级分化(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过程, 结果不仅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革命转变的前途, 不仅否认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与必然, 并且根本取消了现在阶段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 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

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立三同志既然对于中国经济性质有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当然无从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动力。他始终把富农看成小资产阶级（见一九三〇年“布报”四、五期合刊的《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论文或一九二九年的“布报”上立三与和森关于富农争论的文章），以为富农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他把小资产阶级看成整个的阶层，他不知道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中包括有剥削他人劳动的“上层”和不剥削他人劳动或受人剥削的“下层”，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现在有革命作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中大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部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而且他们看成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所谓“第三派”或“中间营垒”。他把学生看成整个的范畴，认为学生是“城市贫民”，不看见学生中的阶级分化过程，认为现在还有“夺取整个学生群众”到革命营垒来的可能。尤其重要地，他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中，讲到一切足以引来中国革命爆发的各种内外矛盾时，忘记或者抛弃了农民与地主阶级这一社会矛盾。他不能了解阶级关系在革命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分化与结合，他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广东时期与武汉时期——尤其是经过广州暴动而开始了苏维埃阶段的时期，阶级力量关系，到底有过些什么实际的转变和变化，他时时在梦想着再来一个“五卅运动”。他不能正确了解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

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份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

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立三同志的脑筋中，始终找不出对于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了解，他根本不曾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他不懂得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主要的是因为现在阶段革命的中心内容——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客观上还未能超过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范围；同时，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上已经怒号着伟大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然而，同时，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还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俄国一九〇五到〇七年革命的进程。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了解，与一九〇五——〇七年的俄国孟塞维克（如马尔托夫之流）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孟塞维克（如陈独秀、彭述之等）的观点正相符合。他以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他对反富农问题的观点便是最好的证明。他说：“……我们因富农兼半地主性，在资产阶级性革命中一定要反动，但他们——指取消派——（附注）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要反对资产阶级，所以要反

对富农。”（见江苏省委一九二九年《教育周刊》第四期——立三的关于反对派与机会主义问题的报告）“而我们之所以反对富农，正因为富农不是资产阶级！”（见立三在江苏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革命领导权与前途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二月）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便指出中国革命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国际执委的历次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全世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都确切指明和确定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前途。同时，并且指出由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相当的一定的必经的阶段，这一转变阶段的时间的长短，要由国际的和国内的斗争环境和力量来决定，大体说来，要比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期转变经过更多的阶段，同时，比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转变速度要快得多。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开辟出社会主义的前途，经过一定步骤和阶段，完成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便是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含有和存在着一定的个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份；而且国际的（苏联的存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空前经济危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增长）与国内（A.反帝国主义斗争；B.不仅与封建残余和军阀制度作残酷的斗争，而且要与中国资本家作残酷的斗争；C.共产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和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维埃形式的政权；D.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与无产阶级

和广大劳苦农民群众的结合，在革命新的高潮的最初几个时期，已经相当地形成起来；E. 工业农业的深刻危机，需要采取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等等）各种条件，都有利于而且促进革命的转变。然而这些条件之中的最主要的条件，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具体地主要地是由自己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争取和实现，共产党只有用正确的政治路线，坚决的阶级策略，灵活的组织方式，灵巧的工作方法和勇敢、坚决、勤奋、艰苦的工作精神与毅力去启发、教育、动员、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和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

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根据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各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根据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对党的任务的了解，根据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目前时局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新高潮的条件之下，彻底保障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彻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之下，去动员、组织、发展与汇合苏维埃区与反动统治区域的革命运动，以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虽然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份，在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以便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

0041341

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在反动统治区域里，加紧发动和领导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部分的日常斗争到较大的政治发动，加紧开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加紧去作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以争取群众中党的政治影响底斗争，加紧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加强党、团、赤色工会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力量，加紧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当然同时还须加紧党、团员军事化、工农武装及夺取敌人武装的军事准备工作），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根据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对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事实上是等待）某个“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的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马上形成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以便马上举行全国武装暴动。苏维埃区域与反动统治区域里的党的任务没有丝毫的差别（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没有一点提到党在苏维埃区的任务，便是最好的例证！）。

根据这样对党的任务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两条政治路线，两个策略，两种组织任务，两种斗争方式与方法，两种工作方法与方式。

（中略）

关于没收和平均分配土地问题

……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都主张“重分富农的土地”，但同时主张富农在其土地被重分后，在不作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之下，可以分得一部分质量坏的“劳动分地”，

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中国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上，完全采取了共产国际及中共这些主张。这种办法的出发点，是因为中国富农主要地是用半封建剥削方法去出租自己的土地来榨取大量的地租，重分富农土地的办法，在目前主要地还只是彻底肃清封建余孽底土地革命中的一种步骤；所以我们主张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分给富农以一定量的劳动分地……

（下略）

第七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张国焘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九页

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第四九六页

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第四九七页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

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
一卷第一八二页

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
集》第二卷第四九六页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
集》第二卷第四九四页

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那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一页

参考文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政治局听了张国焘同志关于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并详细检查了四方面军各种文件及材料之后，认为：

（一）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最后的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二）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惶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三）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

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四）张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在群众工作中，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团体，事实上完全没有工作。苏维埃工作方面，他没有正确的实行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没有建立苏维埃的代表制度，实行苏维埃的民主。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他对于白区工作，完全表示消极，对白区党与群众组织没有信任心。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塞维克的思

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五) 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不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战争中，如何由于红色指战员的艰苦奋斗而得到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然而结果还是不能不被逼放弃天全、芦山，深入西康，使红军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六) 张国焘同志从口头上同意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起，到取消第二中央，与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同中央会合止，是他向党中央路线前进的表示，但是必须指出。推动张国焘同志前进的还是由于党中央路线的胜利与中央对于他的耐心的劝导，也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广大红色指战员的要求，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一部分领导同志坚决拥护中央与反对他的错误的斗争。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七) 中央必须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内的反映。长期的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使张国焘同志，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

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这一教训也使我们明显的看到，张国焘路线是同他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的错误如何紧密的联系着。

（八）中央对于在张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九）中央更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路线做坚决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张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选自《解放》第三十八期，一九三八年五月十

五日出版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 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

一. 张国焘脱党的经过

(一)四月二日张国焘以祭中部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的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二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当他在七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林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林同志报告之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二)张到武汉后,未去八路军办事处,亦未找党,在党外人的秘密保护之下,开旅馆居住。当中央同志将他找到与之谈话时,他公开表示自己已对革命已经动摇,对党的总路线与党均表示不信任,对革命前途表示绝望,不愿再干革命。经中央同志多方劝导之后才勉强搬入八路军办事处。

(三)他住办事处时,曾见蒋介石先生一次,开始即向蒋介石先生说“在外糊涂多时”,完全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回办事处时,又中途逃脱,经办事处同志多方寻找之

后，才找回办事处。在办事处期间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并遍访当地要人，到处进行破坏民族抗日团结与党的团结的各种挑拨离间的活动。最后他自己决定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某负责人见面，并由该负责人派武装汽车将他接去，从此即不知其所在。

（四）张到武汉后，中央曾多方设法劝导，促其悔悟，要他回党工作，万一不愿回党工作，亦望他向党请假，暂时找一适当地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或到国际去，以便改变其思想。但均被拒绝。而在他于四月十七日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负责人后，即以书面申明自己最后脱党的决心。于是中央乃于十八日最后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此决定。

二 张国焘脱党的历史根源

（一）张国焘是中央党内老党员之一，也是犯错误最多的一人。他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因他历次的严重错误，曾被留国际三年余，给他学习机会，改正错误。但他在国际不但不曾改正错误，反而参加了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并联合过托派分子。后来，几次写悔过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国际方才允许他回国工作。

(二) 他回国时已在反立三路线的四中全会之后（一九三一年），当时，他在工作中表示积极，以图取得中央的信任。不久，即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开始时，尚能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但在工作中又进行其小组织活动，以个人的野心为出发点，用无原则的官僚政客手段，拉拢干部，打击坚决拥护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沈泽民同志。这些事实均证明张国焘始终以两面派的手段掩盖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面目。

(三) 在川陕苏区时，他的机会主义倾向又逐渐发展。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悲观失望，最后形成整个错误的退却逃跑的政治路线。从退出川陕苏区到与中央会合，又与中央分裂，成立伪中央为止，是他的错误登峰造极的时期（关于他那时的错误，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他在那时犯了无数为一个共产党员所不应犯的错误，造成了很多不可宽恕的罪恶，违犯一切党纪军纪，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四) 由于他的错误领导的无出路，军中党内大多数干部的不满意，与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宽大政策，所以最后他不能被迫取消伪中央，率领队伍北上与中央会合，表示暂时屈服。后来他又写了几次声明书，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但对于中央当时所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表示怀疑与不满。西安事变时，坚决主张谋害蒋先生及发动内战的方针，同中央的和平方针相对立。在这期间，他仍然处处以两面派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

(五) 张国焘的脱党是有他的一贯的历史根源的，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

三 张国焘在何以统一战线成立之后与抗战紧张之时脱党

(一) 与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其中必然要经过与克服无数的困难与曲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张国焘在抗战未发生之前，即对革命表示悲观，对抗日表示绝望，因此形成了他的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发生之后，他经不起这种残酷的长期的斗争，以至在日寇的横暴的进攻前而表示投降，而离开了最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求得最后解放的唯一正确路线。本党是这一路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与执行者，因此，本党和国民党合作是出于至诚的，而不是暂时的与敷衍的。但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为彻底实现民族解放的任务以及将来共产主义的任务，本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保持是绝对必要的。但张国焘始终不了解这一点。在国共合作尚未成立以前，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表示怀疑与不满，在国共合作已经成立之后与正当抗战紧张之时，他又转到另一极端，走到投降国民党。

(三)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长大起来了，党的影响也扩大了。无数纯洁的革命分子要求在党的领导之下工作奋斗，并大批的加入党。但是，在另一方面，党内最少数最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这个民族革命的浪潮，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在其挑拨离间与各种诱惑之下，发生动摇腐化，

丧失了阶级的立场，以至个别的脱离党。这种个别脱离党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最近如周昆、张绍东、李龙贵等的逃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张国焘的脱党，外界对他的这种影响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对于资产阶级这种影响，我们不能有过分的夸大的估计，因为这只能够影响个别的动摇分子。党就要在清洗这些投降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的斗争中来巩固自己的团结与力量。但对于这种影响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与十分警惕的。

(四) 党在中央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党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八路军在抗战前线的胜利与模范的作用，更加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过去受过张国焘路线影响的同志，也因中央正确的开展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都能了解到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而拥护中央路线了。因此，在两面派掩盖之下的反党的张国焘路线得不到党内任何同志的同情与拥护。他的反党的言论与活动，处处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张国焘在党内是孤立了，他在党内寻找群众的一切企图是失败了。于是他只有从党内跑出去，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他的会见陈独秀，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张国焘脱党以后的前途。

四 党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

(一) 中央对于张国焘过去的错误曾一贯的采取了教育

与说服的方针，就是在他犯了成立伪中央的那样严重错误之后，中央仍本宽大精神用一切方法多方诱导，并仍分配他以负责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一切这些仁至义尽的方法终究挽救不了这个腐朽的机会主义的没落。中央过去对于挽救一个犯错误的党员实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二) 张国焘的出党对于本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这使我党清洗了自己的队伍，使我党更能健康的与巩固的向着自己光荣的前途迈进。

(三) 在清洗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中间，各级党部更应该坚持民族抗战，坚持扩大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以最后战胜日寇的总路线，加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同一切个人野心的派别的无原则的破坏纪律的行动以及同生活上的腐化现象做坚决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同志，巩固党内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与团结。

(四) 在反对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中间，各级党部应该加紧向全党同志解释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与意义，使他们清楚了解，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是和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不可分离的。应该加紧对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能够灵活的使用这个尖锐的武器去为民族解放的事业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

(五) 中央对于坚决反对张国焘叛党行为、与坚决拥护国际和中央路线、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张国焘的影响与是否犯过错误，都是一致爱护的。各级党部不得因反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而无根据的牵涉到或怀疑到任何忠实同志。同时，估计到张国

焠出党之后必然从党外千方百计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自己政治上与组织上的警惕性，严防张国焘的挑拨离间欺骗煽惑与破坏。

（六）让张国焘等这类腐化的叛党分子滚出去吧。更加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加强党的团结与一致。吸收成千成万的优秀的革命分子到党内来，回答这些东西的叛党吧。

让我们全体忠实的共产党员高举起马克思与列宁的旗帜，为最后战胜日寇，为民族的、社会的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附录：

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建国诸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

张 国 焘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公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澜言（如加本人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

高于一切。

(三) 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以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 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话讲，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证中共负责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均有放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般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

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到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
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

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民主义的本质而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再接再励，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革命的，抗战

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变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近来习闻

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相左之抗日份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谓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谬误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界封锁尤严。如斯作法，岂以为人尽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

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二十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忆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复按。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

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认中共彼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份子。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势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爱护中共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诚披沥所抱之见解，深

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亦全体民族之福也。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选自《革命领导权》，一九三八年七月初版

第八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王明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

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四

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九六页

同志们可以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止，这七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九九页

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

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第七五(一)——七五一页

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第四九七——四九八页

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一页

还在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时,又在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特别是在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时,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

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一页

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奋斗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

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一——三六二页

几个月以来，主要是抗战以来，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组织，对这种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投降主义倾向作了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并且收到了成效。

在参加政权问题上，中央发出了一个决议案的草案。

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上面。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据地，同样

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当然并不是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这种议会主义在中国党内是没有的），坚持了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

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

在陇东，情况和西安大体相同。

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

在南方各游击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在芦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政策企图削弱的力量——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在《解放周刊》，坚持了严正的批评态度。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二——三六三页

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

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三——三六四页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 this 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是不可分离的。几个月来，更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群众是在我们的影响下团结起来了，国民党营垒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长中，山西的群众斗争是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三——三六四页

必须清楚地懂得，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

还是微弱的。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四——三六五页

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

但是还有一种投降主义，这就是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它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五页

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

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六页

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〇三页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

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〇四——五〇五页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

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五三——一一五四页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一一——七一二页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

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一二页

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

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一三页

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一三页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一四页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人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

派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一四——
七一五页

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
选集》第二卷第七四〇——七四一页

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芦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可能发生的，一方面是轻敌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这些在国民党中都是发生了的。国民党当它从国内战争的战场向民族战争的战场转变时，主要由于轻敌，同时也

存在着一种恐日病（以韩复矩、刘峙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然而我们却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这是由于广大的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而获得的，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五一五——五一六页

参考文件：

中共扩大的六中 全会政治决议案（摘录）

——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的决议——

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同时一致指出党在这时期的进步与成绩。党在政治局领导，全党同志努力，和全国军民拥护之下，在极艰难复杂的条件之下，顺利的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从国内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各政权对立的局面，转变到提出和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于抗战基本趋势的分析，对于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和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以及其他事项，扩大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同时，扩大的六中全会一致指出下列诸项，以为全党同志努力奋斗的准绳：

一 中华民族十六个月抗战的基本总结

日本法西斯军阀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武装侵占我东北四省之后，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来，更实行大规

模的侵略战争，来进攻我国北部、中部及南部各省。其目的是企图灭亡我中华民族，吞并我整个国家。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由于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的坚持的奋斗，由于全国军民奋起抗敌，已经掀起了伟大的英勇的民族自卫战争。十六个月来的抗战，是我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伟大历史事件，造成了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团结和进步：长期受外敌压迫的民族抬起头来了，分裂的国家政权统一起来了，对立的党派携手合作了，互相斗争过的军队变成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了，国家政治制度开始走向民主化了，穷苦的民众大批的起来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了，在敌人后方空前规模的游击战争发动起来了，中华民族的英勇苦斗已为全世界所同情所钦佩了。在抗战烈火中，旧的阻碍进步的和分裂国家的屏障是在破坏着，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为一个统一力量的过程和民族自强的新生命是在生长着。

十六个月的抗战，虽因敌我力量的悬殊，损失了许多的大城市与铁路，牺牲了数十万的英勇战士，全国人民遭受了莫大的灾难。然而我们打破了日寇的速战速决的计划，消耗了敌人数十万兵力和数十万万经费，增加了敌寇内外的困难，博得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对敌谴责和对我同情。十六个月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有抵抗外寇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然而求得速胜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这是因为，敌是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比较发达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但敌为小国，人少兵少；其进行的战争是野蛮的侵略战争，违反本国人民利益，遭受世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是在死亡的道路上下发展。我是半殖民地国家，工业与军事技术比较落后。但我为大国，人多兵多，

地大物博；其进行的抗战是进步的民族自卫战争，合于全民利益和受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在抗战中的中国是在解放、自强的道路上向上发展。因此敌在长期战争中将愈战愈难，愈战愈弱，一直到最后失败。我在长期抗战中将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一直到最后胜利。这个过程将表现在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在敌方为进攻——相持——退却，在我方为防御——相持——反攻。在第一阶段中，我国的统一团结与进步，建立起持久战的必要基础。但因敌我力量的悬殊，使我不能不在正面采取运动防御的战略，在敌后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敌人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与消耗。这样坚持的结果，将迫使敌人停止其战略上的进攻，而使战争进入到敌我相持的阶段。在我力量准备完毕时，我将配合日寇的更加困难与国际的有利条件，实行反攻，以达到驱逐日寇出中国的最后胜利。战争的长期性，要求我中华民族长期的艰苦奋斗，要求我国共两党和一切抗日党派长期的亲密合作。用一切努力，团结和组织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这是保证抗日持久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

二 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

目前的抗战，正处在抗日持久战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与将来相持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一方面我国的困难加多，另一方面我国更加团结与更加进步。武汉广州相继不保，大工商业的丧失，主要铁路的被占领，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在地域上的被分割，主要海道的被割断与外援的暂时减少，以及财政经济交通的困难，军火供给的不易，这些都是目前抗战形势及将来相持阶段中的困难

现象。同时，日寇正在计划成立全国的伪政权，并加强其挑拨中国内部的阴谋，而汉奸亲日分子也正在利用这些困难加紧其投降妥协的活动。由于这些困难，可能在一部份人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由于这些困难，抗战阵营中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某些分子的动摇与局部叛变。这些都是目前及今后抗战中的严重问题，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方面。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估计到中国的更加团结，更加进步，与日本困难的同时增多。……全国人民的不动摇的坚持抗战，国共合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国共两党数量上的发展与其政治影响的扩大，全国人民对日仇恨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中国还保有广大的完整地区（西北、西南）作为抗战的总后方，而在敌后方则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抗日根据地正在强大着，英勇的中国军队积蓄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并正在巩固其战斗力，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的民主化（尤其在敌后方抗日根据地中），广大民众正在发动与组织起来。同时，日本因战线延长将更感兵力的不足与分散，离开海岸铁路大河的山地战斗，将给日寇以更大的困难，敌后方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发展，将陷敌军于到处受击，忙于应付，消耗疲惫的境地。日本在华南的行动，势将引起美日、英日、法日关系的更加尖锐化。日本坚持侵略与中国坚持抗战的结果，将使日本人民处在长期战争的威胁中，而日益增长其反战反法西斯的运动。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我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客观有利条件。而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中心关键，就在于进一步团结我全民族，强固我国共合作，坚定我抗战信心，增长我新生力量，以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百折不挠的民族自卫战争。诚能如此，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无疑的是

能够实现的。

三 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根据上述的抗战总结与抗战形势的估计，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在此基本原则下，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则应该是：

（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

（二）诚心诚意的……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四）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

（五）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

（六）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机构，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

（七）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八）为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忱，实行相当必

要的民生改善。

(九) 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

(十) 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

(十一) 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医药材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

(十二) 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

(十三) 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

(十四) 厉行锄奸（汉奸、敌探、托洛茨基分子等）运动，巩固抗战的前线和后方。

(十五) 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

上述各项，实为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具体的任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相信，由于这些任务的执行，中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之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中略)

五 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的儿女，以满腔热忱和无限英勇参加反抗日寇保卫祖国的事业，是真正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国际主义战士应有的态度和必需的工作。共产党

员必须在民族自卫战争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模范战士的作用。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应该是在最能打击日寇的地方——前线和敌后方。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共产党员应该根据民权主义的精神，在政治上组织上尊重各党派的独立性，应该成为尊重国民党和各抗日党派的独立性的模范；同时，应该坚持保证共产党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队伍中，应该成为智勇善战，执行命令，服从纪律，建立优良的官兵一体、军民一体与争取敌军的政治工作的模范。关于这一点，全会特别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及战斗员，在抗战中已经起了极光荣的作用，以后应该更加发扬这种作用。共产党员在行政工作中，应该成为廉洁奉公，不贪污，不腐化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成为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不包办，不独断，与他人友谊的民主合作的模范。在对待一切非共产党员的态度上，应该是真诚和尊重合作的模范。因此，广大的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性的布尔塞维克的政党，不仅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本身的迫切任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伟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

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的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更加改进《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的內容，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等。必须建立和加强能独立工作的地方党部，培养在党、政、军、民各种工作中有声望有信仰的领导人材。同时，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去反对危害党、危害统一战线、危害抗战事业的“左”右不正确的倾向。目前左倾关门主义分子的危險，在于他们不了解在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同时，在于他们不认识抗战形势而产生的左的急性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險，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他们在困难前面失望，而发生对抗战形势及前途的悲观主义。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和采取两面派手腕，进行反党反中央斗争的张国焘，现在成了公开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和逃兵。政治局代表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是绝对正确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意见，即是：“张国焘的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

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当然，各级党部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因不了解和无经验而犯错误的同志们，应当加以耐心的说服和细心的教育，乱加同志以“左”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错误，必须严格的纠正。同时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最后，六中全会特别唤起全党提高革命警惕性，以锐敏的注意力去严防日寇及其走狗——托洛茨基分子及一切汉奸和反共的分子们在共产党内部外部所进行的各种挑拨离间和破坏危害的阴谋诡计，以布尔塞维克应具有的党性来揭发和反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采取两面派方法的）反党的和危害党的分子。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六中全会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共产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中央及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干部，和各中央局及省委的团结和统一，是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最基本前提，同时也就是争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指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死敌，而且是日本人民的仇敌，同时又是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先进人类的公敌。因此，“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与全体先进人类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坚决相信：具有五千年文化

历史，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我伟大中华民族，在全民族团结，国共长期合作的条件下，在日本人民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条件下，在全世界爱护和平的民族国家与所有先进人类的同情与援助条件下，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在持久的艰苦的奋斗中，进行反对日寇的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光明的前途已见曙光，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中华民族的。

选自《解放》第五十七期

附录：

挽救时局的关键（摘录）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王 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十二月二十五日对时局宣言）郑重地向全国同胞指出：“我国抗战目前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然而部分领土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及初期战线上的部分军事的胜败，均不能决定中日战争的最后命运，而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强团结和长期艰苦抗战之毅力与信心，实为争取最后胜利之保证。目前最大难关，既不在于兵力不济、武装不足和财政困难，亦不在于日寇的前进深入，而在于敌寇于暴力之外，又加紧‘以华制华’的企图，在于汉奸敌探托匪加强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的阴谋，尤其在于我国民族力量的团结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也说：“外敌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由此可见，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同时，事实已经确切证明：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策，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怎样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首先须更加巩固和扩大我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大家都晓得：国民党已经实行了联共抗日的政策，红军

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名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苏区已改为中华民国的边区，因此，国共合作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但同时，大家也晓得：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种种原因，国共两党的合作，直到现在，还未达到中国现时环境和两党主观愿望所要求的应有程度。因此，当目前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困难关头，怎样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团结，已经不仅成为国共两党同志所日夕关切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每个关心国事的同胞和每个中国友人所深切系念的问题。

怎样才能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呢？一方面，须要将有关两党合作的各种基本问题解释得清楚明白；另一方面，须要采取许多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具体办法。应当毫不隐讳地说：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虽然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和大多数党员都有了两党合作必要的组织和决心，虽然国共两党合作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事实，但是，在两党方面的确都还有少数人不清楚了解两党合作的许多基本问题。

这些人不清楚了解的有那些主要问题呢？

第一，他们不清楚了解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原因和主要目的——他们不清楚了解，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原因，不仅由于十年来的沉痛经验和教训证明，国共两党的合作，能使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境地，国共两党的分裂，造成十年来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而且首先由于在国共两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扑来了穷凶极恶的公敌——日本法西斯军阀；因此，他们有时忽略了甚至忘记了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目的，便是共同战胜民族公敌的日寇，以争取和保障中华民族之生存和独立；因此，他们有时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

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于是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于是忽略了“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的简单真理，于是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因为有时把其他问题与抗日问题并列或对立，以致模糊了今天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有时甚至把抗日问题看得比其他问题为次要，以致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中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或裂痕。

第二，他们不清楚了解对统一战线中的友党应有的态度和方针——他们不清楚了解，统一战线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政治团体，在共同纲领基础上为反对共同敌人和达到共同目的而共同自愿的团结，他们不清楚了解，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友党友军力量的削弱即等于自身力量的削弱，即等于敌寇力量的助长，即是为“仇者快”和“亲者痛”的事情；他们不清楚了解，在统一战线营垒中有时某些磨擦虽难于完全避免，但双方应该设法减弱磨擦以增进共同抗敌的效能，而不应故意去挑动和扩大不必要的磨擦；因此，他们不清楚了解，对同盟者应有态度不是一方面压迫另方面或者一方面投降另方面而是双方面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因此，他们不清楚了解，对同盟者应有的方针不是互争雄长互相倾轧和互相捣乱，而是双方面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和共同胜利；因此，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对付敌人的态度和手段拿来对付自己的朋友，因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作下了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利于敌寇的事情。

第三，他们不清楚了解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他们对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具体国际环境和国内

条件认识不清楚，他们对于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得还模糊，因此他们看不清楚中国最近历史时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们时常容易听信日寇和汉奸有意散布的各种谣言，因此，甚至那种最无根据的所谓“抗战失败了是日本人天下，抗战胜利了是共产党组织苏维埃的天下”这类挑拨离间之词，对他们还能发生若干的影响。我记得，还在今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后，便有过这种类似的谣言，那时便有人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不过是一时的手腕；在这种合作建立以后，或者更具体些说，在反日斗争的终结甚至过程中，共产党员一定很快掉转枪头去反对国民党。”当时我们对这种说法便曾公开地回答说：“第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为中国民族独立的斗争，一般地讲来，绝不是一件很容易和短时间的东西；第二，中国共产党员不仅希望与国民党在反日斗争的期间合作，而且准备着与一切优秀的国民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起，为伟大中国人民的完全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将来而奋斗。”（见拙著“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现在，为的使这个问题有更清楚明白的了解起见，我认为必须更明白地解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现在阶段上放弃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的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阶段上放弃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并将苏区改为中华民国底边区的这件事，既不是仅仅将苏维埃改变一下名称，也不是玩弄一下什么暂时的手腕，而是真正地有一定革命斗争阶段上改变了自己的革命战略方针，即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更，根据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团结全中国一切民族力量去实现

抗日救国的任务，自动地由原来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的战略方针转变到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所提的这一民主共和国的性质，虽不能不有别于过去历史时期中由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所形成的欧美某些国家的旧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它还绝不是苏维埃式的或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它将是而且一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胜利过程中产生的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是一切参加对日抗战到底的各种力量所共有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至少是对于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的政策的实质不曾真正了解。第二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就是中国现有的实际情形。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是：如果国共两党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达到驱逐日寇出境的胜利，那么，国民党在实际上证明其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国民党的领袖蒋先生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那时候，谁能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呢？当然，同样，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将是更加为中国人民所爱戴和拥护的重要政党之一，谁也不能违反民意而进行打倒共产党的行动。那时候，很明显地，国共两党将因患难相共艰苦共尝而更加亲密携手地进行共同建国的工作。如果不幸而抗战失败，国共两党将为反对共同死敌而更加互助之不暇，更那里谈得上谁打倒谁呢？由此可见，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不但是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形太隔膜，而且是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无信心。这显然是非常有害的事情。

由此可见，明白地解释有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各种基本

问题，首先是使大家明白了解：今天合作的主要原因，为民族大敌当前；今天合作的主要目的，为共同抗日；对同盟军的应有态度和方针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前途，应当是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都是现在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为了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现在须要采取那些主要具体办法呢？

第一，须协商和通过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第二，须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代表组织的经常协商和议各种问题的组织；

第三，在军事问题、政府问题和民运问题各方面，国共两党应该更加巩固和扩大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以便达到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加强和充实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真正达到全中国人力、武力、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对日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

只有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才能真正更加巩固和扩大团结全中国人民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同时必须清楚明白地承认：国共合作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中心，但决还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在国共两党之外，一方面，中国还存在有若干已经有组织的党派和团体；另一方面，还有极广大的尚无组织但必须组织的各阶层的民众。因此，国共两党必须共同努力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即是将国共两党以外的一切抗日党派团

体和广大民众吸收和组织到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怎样才能
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呢？同样
是，一方面，必须清楚明白地说明与此有关的几个主要问
题；另一方面，必须采取许多有效的具体办法。

有那几个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的主要问题必须
说明呢？

第一，必须承认国共两党以外，在中国还有其他抗日党
派和团体的存在——不错，国共两党是中国力量最大和群众
最多的政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同时，
从严格意义上说，除国共两党以外，在中国的确没有其他的
群众性的政党；但是，必须承认：国共两党今天还未能包括
中国社会中的一切抗日力量。在国共两党之外，因中国社会
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存在有相当数量的政治集团，他
们虽然都未形成群众性的政党组织，但他们当中有许多已经
形成为相当的政治派别。为着团结全民族力量去进行抗日救
国的事业，国共两党应该共同设法吸收他们到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组织中来。

……

我所以说国民党内部某部分朋友们不是法西斯蒂派，也
不仅是由于这些朋友们再三明白说明过，他们绝没有什么法
西斯蒂一类的组织，他们相信的依然是中国国民党；而且中
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证明说：中国今天只能有反抗法西
斯民族侵略的理论和组织，绝不应有赞助法西斯民族压迫的
言论和团体；中国优秀青年今天只能追求和信仰推动社会进
化的思想和组织，绝不应堕入和误信反社会进化的主义和团
体；国民党员应当是忠实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

学生，绝不能成为背叛总理背叛三民主义的反动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信徒。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三民主义的根本主张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实质恰为民族侵略、摧残民权和戕杀民生。因此，谁也不能相信：任何优秀的国民党员愿从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变为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走卒。我们相信，救国会的朋友们和国民党内的某部分青年们，都是中国社会中的抗日救国的一部分力量；因此，我们诚恳希望他们相互打击奸人的各种挑拨离间，手携手地共同奔赴抗日救国的战线。

由此可见，明白地说明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的各种主要的问题，首先是承认国共以外有其他抗日党派的存在和有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必要；其次，认清汉奸敌探不但不在联合团结之列，而且为统一战线反对之对象；承认吸收已有组织之群众和组织及尚无组织之群众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以及解除一部分人错认救国会为“人民阵线派”或国民党内某部分人为“法西斯蒂派”的误解；这都是现在在国共合作基础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

.....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摘录）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王 明

一 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

……从去年十二月上半月前一次政治局会议到现在的三个月过程当中，我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一些新的进步，军事方面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一）南京失陷后一部分军队溃退的现象已经克服了；（二）我国军队在第一期抗战中所受的相当严重的损失，在基本上已经补充起来了；（三）我军作战的战略逐渐转向到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的战术也较前更广泛的运用，并且开始收到这一战略转变的成效；（四）军纪和士气的提高，军队一般的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和牺牲决心。如在第一期作战时，战斗力较强者为中央军、两广军、八路军等，而第二期作战中，其他各部队均有显著的进步；即有些原来抗战不力的部队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而英勇地走上抗敌的前线为国效命；（五）大部分部队能够留在敌人占领区的后方和两翼坚持抗战；（六）大批新的军事的、军事政治的和军事技术的青年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开始具体准备建立有新式武装技术的部队；（七）空军力量的增长和空军战斗的屡建奇功；（八）政治部组织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始。

政治方面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一）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有进一步的巩固；（二）政府中骈体和重叠机关的裁撤，军事委员会效能和威信的提高；（三）对抗战将士奖惩条例的颁布和执行；（四）惩治贪污明令的颁布和在有些地方开始反贪污的斗争；（五）许多省分庶政开始有部分的改革（如山西省明令废除苛捐杂税，广西、广东方面民众运动和民众武装工作的更加开展，安徽、山东、湖南各省的政务开始改进等）；各省开始大批培养青年政治工作干部；（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式的民众运动有初步的开展。

……

二 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武汉不被敌占领的目的；同时，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事业具有最高度的热忱和抱着最坚强的信心。但是，我们也应当有更深远的认识和更长期的准备，即我们应当假定和确定：在武汉不失的条件之下，我国固然能够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即在武汉不守的情势之下，我们抗战虽然要遭遇更大的困难，但继续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的。

有那些基本条件决定我国能够继续长期抗战和能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呢？

第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是我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本身具有伟大的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许多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就是：（一）全民族力量的坚强团结——首先是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二）全国

统一的政府，数百万统一的军队和民众武装的存在和发展；

(三) 最众多的人口；(四) 广大的领土；(五) 丰富的物产。

正因为我国具有这些优良的基本因素，所以敌人虽然能挟其较我优势的兵力，六年之内占领了我东北辽、吉、黑、热四省领土；八个月之中又占领了我冀、察、晋、绥、鲁、江、浙七省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最近又将其兽蹄践到皖、豫两省一部分疆土；但敌人“以华制华”和“速战速决”的企图均宣告破产，而我国的抗战力量却再接再厉，屡败屡战，愈战愈强。也正因为我国具备有这些优良的基本因素，所以，不仅使我们保卫武汉和第二期作战抱着极大的信心，而且使我们敢于假定和相信，即在武汉不保的情形之下，我们依靠着湘、赣、闽、粤、桂、川、滇、康、藏、陕、甘、宁、青、新等十四省区两万万以上的人口、广大领土和富源作根据地，配合以我国广大军民在敌人占领区域中的广泛运动战和游击战，定能坚持长期抗战并在长期抗战过程中达到消耗敌人以至最后驱逐和歼灭敌人的目的。

……

第一，对军事问题的一般意见：(甲) 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战初期只是八路军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八路军不能作阵地战，因为没有重炮），在平型关、广阳等战斗中，获得显著的打击敌人和歼灭敌人的胜利。在第二期抗战中，大部分在山西和山东、河南等战线上的我国部队，也都开始采取运动战为主的战略；在江、浙、皖各地，我军和地方人民武装也开始比较广泛的采用游击战术；所以

能获到最近一个时期部分打击敌人和歼灭敌人的成效，特别是鲁南和山西各战线上的相当重要的胜利。为的保卫武汉和在河南、山西、山东各战线上给敌军以更大的打击，我们必须坚决确定及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之以游击战和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为的能够真正顺利地实行这一战略，必须：（1）组织相当数量的野战军团，在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和消耗敌人；（2）组织相当数量的挺进军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3）扼守几个重要支点，以阻止敌军的前进深入。（乙）建立真正统一的、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国民革命军：为的战胜武装优越的敌寇，须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还远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便即公开的提出。我们所提的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既不是脱离开中国原有军队而纯粹另外去创造新军队，也并不是说把中国所有军队联合统一起来，作抗日联军的名称，而只是表示我们希望：第一，把原来国内各种不统一的军队，联合而成为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第二，这个统一的军队要担负起来保卫国防的责任，在中国现在具体条件下，即是说，担负起抗日的责任。统一军队要具备那些基本条件呢？我们始终认为它应有下列几个基本条件：（1）统一指挥；（2）统一编制；（3）统一武装；（4）统一纪律；（5）统一待遇；（6）统一作战计划；（7）统一作战行动。现在我国已经开始有了统一的军队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1）过去各种不同系统的（如中央军、红军、各种地方军队等）军队编成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2）这些军队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这些军队正在努力执行统一作战计划和表现统一作战行动。

但是，同时对于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等问题却至今还未能做到。统一待遇和统一武装，既为抗战本身的事实需要，已成一切抗战军队的共同要求，所以毋庸加以解释；至于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方面，我们提议：一方面根据作战需要和利益，另一方面选集各军队的优点和长处，来建立一个真正尽善尽美的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怎样才能做到部队的政治坚定呢？在今天，这至少需要进行下列三件基本工作：（1）立即在军队中普遍地建立起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制度；最近军事委员会下已设立政治部，这是一件值得注意和称赞的事情。我们希望政治部负责人员和工作干部，能毅然恢复北伐军时代的政治工作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参照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军队中普遍地建立起政治工作机关，慎重地选择工作人员，认真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以达到提高我军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以达到建立军民一体的亲密友善关系，同时，达到瓦解和夺取敌军的目的。（2）军官与士兵共甘苦、共死生，达到官兵一体的地步。（3）迅速普遍地改善征兵制度——我国既无国民必需服兵役的教育准备，又无详细的人口登记和调查；同时，再加以实行征兵时也未明白规定应征兵役年龄和期数（即第一期应征者为某年出生，年龄达若干岁之壮丁，第二期应征者为某年出生之壮丁等），因而变成普遍抽丁的办法，于是，许多地方的土劣及保甲长，乃乘机将征兵变为敲诈勒索的差事，有钱人家虽壮丁多也可以出钱买别人去顶替，没钱人家虽壮丁少也被强迫拉去当兵；甚至在许多地方发生强迫捉人当兵，闹成天怒人怨的现象；那些被强迫捉去当兵的人，既然不能明了当兵的意义，当然不能有充分的战斗力。为补救征兵制

现在缺点和特点，我们以为一方面必须在广大民众中作抗战和兵役解释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暂时仍采取以募集志愿兵为主要办法，以逐渐过渡到实行普遍征兵制；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人民爱国热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绝不愁没有千百万壮丁自动到抗日军队中去尽抗日救国的神圣天职。只有战士们都懂得为什么而战为何人而战的军队，才是政治坚定的武装力量。怎样才能使部队的战斗力强呢？在中国今天的具体条件下，除上述的统一和政治工作等外，必须：（1）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战略战术的训练；（2）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技术（航空、坦克、铁甲车、军事化学、炮科等）的教育和学习；（3）培养大批新的军事的和军事技术的干部人材；（4）加强现有军队的近代武装。

（丙）建立几十师团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我们绝不能使我国几百万军队都有足够数量的新式武装，但我们不能不努力建立几十个师有现代武器的部队为全军的骨干，为的达到这一目的必须：（1）利用一切时间空间和争取更多时间空间来建立这种部队；（2）坚决抽出成立这几十个师为建立这种新军之用，平时绝不轻易动用这些部队；

（3）努力取得必要数量的新式武器；（4）认真培养善于使用这些新式武器的技术干部和能指挥近代作战的军官人材；（5）以大公无私的态度从各种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部队中抽调一部分队伍出来作为建立这种新军的组成员，抛弃一切派别和门户的偏私之见。只有在一定时间内我国能创立出相当数量的有新式武器的国防师作为全军的骨干，才能真正谈得上准备了对敌人反攻的军力，才能达到在长期抗战中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中央

再三要求我国政府及军事当局和全国军民，用异常严重的注意和决心来解决这一个对抗战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丁）迅速建立和扩大军事工业和加速军事交通线：以我国落后的技术基础和抗战的时光迫切，当然我们不能很快建立高度的军事工业（如摩托及重要机件制造等）；但是，我们应当而且可能把我国一切工业基础和物质条件搜集和利用起来，在友邦技术和人材帮助之下，迅速建立起最起码的新式的军事工业（以装修飞机、坦克、装甲车等开始，直做到买得摩托后，可以自己制造这些武器）；同时，应大大地扩大现有的兵工厂，以便大大地增加枪炮子弹等的出产量。必须努力改良和扩张军事交通网，以便利用国内外军事运输，现有的军事交通情形，是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建立和扩大军事工业，不仅是现时抗战中的一个最紧要的问题，而且是使中国国防力经常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根本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中央再三建议我国政府及军事当局严重注意这个问题。

（戊）加速普遍地给军民以防毒的常识和设备：日本法西斯军阀在上海和北方战线上曾开始试用过毒瓦斯来毒死我国军民，今后当敌军困难增加和失败屡见的条件之下，将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放毒杀人的非人暴行；因此我国政府和民众，应该一方面加速努力进行防毒的教育和设备；另一方面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工会和民主政党和团体、卫生慈善团体，以及国际联盟和英、美、法、苏等各国政府起来抗议和制止日寇的此种野蛮举动。

第二，对国内政治中几个迫切问题的意见：（甲）对巩固和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救国团结问题：信仰自由和各党派不能取消而应并存合作，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这一个

真理，不仅由毛泽东同志在其今年二月十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中，代表中共发表过明确的意见，而且已为国民党的贤明领袖和绝大多数干部党员等所共信；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但巩固和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既为人民愿望和抗战事业所必需，因此，政治局会议一致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在于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应有下列三点：（1）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2）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3）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统一战线纲领内容，由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等）代表共同商讨和拟定；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或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战有利，中国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诸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乙）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希望：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个大政党，因此，凡是真诚抗日救国的人，都热望国民党本身工作有更大的改进和加强。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才企图在南京等地伪造国民党组织来污蔑国民党，才希

望国民党坏。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女儿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抱着生死与共的真挚的热爱，对于侵略我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阀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对于继续坚决对日抗战和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事业，抱着无限的忠诚和信心；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我国领导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发展，有更大的增强；因为国民党愈加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就是等于抗战事业的愈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因此国民党愈加进步和强大，不仅是国民党本身有利的事情，而且是全民族有利的事情，同时，也就是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有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诚恳和热烈地希望国民党本身有如下的改进和加强：（1）淘汰贪污腐化及一切不忠于党、不忠于抗战革命事业的分子，以刷新党的组织；（2）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和进步人士到国民党组织中来，以增进新生力量；（3）在组织内实行真正民主集中制（即：少数服从多数，问题未决定前党员有充分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权利，决定后，无论个人意见如何，必须执行组织的决议；下级必须执行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如对上级决议和指示有不同意见时，可向上级提供意见，但上级未改变决定前仍须执行等等）以健全党内生活和培养大批干部人材，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袖和领导机关威信绝不冲突，恰恰相反，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领袖和领导机关才更有威信、更有作用，以前中山先生为国民党的总理，同时，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在党章上毅然采取民主集中制，结果，使中山先生威望作用更

加增大，同时，党的组织内健全生活也建立起来，党内大批新的干部人材，也产生出来，便是明证；（4）加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以巩固党的统一；（5）提高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使党员均能自觉地为党、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国民党的贤明领袖和党员同志们，对于国民党本身工作改进和加强，当然具有卓见，我们谨以友党兄弟之谊，向国民党提供上述几点意见，不过作为参考的资料。（丙）对于统一政府问题的意见：为的保证抗战事业的胜利，必须有全国统一的政府，这是我们自始至终的坚强信念，所以不仅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上，中共中央便提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同时，再三说明这一口号的意义和内容，既不是推翻现有的国民政府，也不是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名称，而只是说明，须使国民政府成为统一的政府，并实行抗日以尽保卫国防的任务；而且我们早已在实际上将苏维埃政府改成为地方边区政府，以推进和促成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这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关于边区政府人选及行政系统问题，中共代表曾再三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负责同志说明，并再三得到蒋先生的同意和答应，明令不久即可发表。在陕甘宁边区中不仅共产党有合法地位，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合法地位。在陕甘宁边区中，因为地瘠民贫，我们还做不出什么值得满意的业绩。我们现在做到的，不过是：肃清了贪污土劣，废除了苛捐杂税，相当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广泛地给予了人民以民主自由，教育和组织民众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所有这一切，我们认为不仅是陕甘宁边区民众热烈欢迎的事情，而且是全中国同胞急切盼望的事

情；不仅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实行的事情，而且是一切真正中山先生信徒应该进行的事情。因此，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应有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中华民国领土内应该普遍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绝不能说是违背中央政府的意旨，相反地，照我们想，应该是为中央政府赞许的地方自治的庶政。此外，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冀察边区三十几县中，一切行政系统和人事问题，均系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对中央政府与任何地方政府因某种问题有误会和磨擦时，中共总是始终站在维护统一和抗战的大原则下去力求取得合理的解决，所有这一切，都在事实上证明我们共产党对于拥护统一政府的问题的光明正大的立场。

此次政治局会议更一致坚决认为：我们不仅在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之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因为抗战愈困难，民族危机愈深广，对内对外，统一政府的需要更迫切、更必要。因此，有少数企图用陕甘宁边区问题来诋毁中国共产党“破坏行政制度统一”，甚至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封建割据”等，以便破坏国共两党抗日救国的团结，以便挑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误会，这不仅是一种抹煞事实的昧心之谈，而且是一种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有害之举。（丁）关于建立健全民意机关问题：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民众和政府抗战建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设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至于民意机关的形式，政治局会议认为：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国民大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1）此机

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各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材。（2）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戊）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政府和军队的最大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全体动员和积极参加，这是古今中外再三考验过的真理。

……我们提议将工、农、学、商各界按照其职业地域而组成各种职业的联合团体，将青年、妇女、文化界等按照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组织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将已有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无组织的民众吸收到各种群众团体内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这些团体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之下，发挥各群众团体自己的工作，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

此外，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帮助政府动员和组织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而且要注意去艰苦动员和组织被敌占领区域的同胞。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总方针，应该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帮助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和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敌军占领区域的民众运动的总方针，则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反对和推翻敌军及其傀儡组织的统治，使它们在军事上不断失败。因此，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以合法、统一和互助合作为原则。在敌人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工作方法，必须是严守秘密利用合法的可能以达到动员和组织民众去推翻敌伪统治的目

的。

(下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学习材料 上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

页数=326

SS号=11199576

DX号=

出版日期=1975.10

出版社=

前言

目录

目录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毛主席著作：民众的大联合（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四日）

参考文件：共产党底根本主义（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共产党》短言

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共产党》短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第二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十一页；这里所列的页码为精读部分。下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同上书第十二——二十二页）论反对日本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录：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陈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陈独秀

第三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十七——五十五页）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上书第五十六——八十二页）星星之火，可以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瞿秋白

第四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八——一三九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同上书第一七——一八 页、第二一 ——

附录：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李立三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五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参考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录：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一九三一年一月）&罗章龙

第六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九页、一七一、一八八——一九 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 (同上书第一四——一四

附录:中央四中全会决议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摘录)(一九三一年二月)&陈绍禹

第七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九页、一八二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同上书第二卷第四九二——四九八页)整顿党的作风(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报告大纲(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

附录: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央同仁商榷抗战救国诸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张国焘

第八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著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五七——三六九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同上书第四八五——五一页)统

附录:挽救时局的关键(摘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明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摘录)(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王明